

第五章 戰後初期的時代精神 及文學所反映的現代性

第一節 戰後初期的時代精神與現代性

一、重新追求現代性

(一) 對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希望與三民主義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投降使臺灣從受日本統治半世紀之久的殖民地處境中得到解放，並重新找回主權。不過，戰爭的結束歸因於聯軍的勝利，是以臺灣主權的移轉，亦在國際秩序的重整之中進行。因此，臺灣人民雖在殖民期間不斷的發動抗日獨立運動，¹但在光復之後，依舊無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實施自治。光復後的臺灣，依強國之間所簽定的關於戰後殖民地處理問題的協定—開羅宣言，歸屬於國民黨政府所領導的中華民國，並在1945年10月25日成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臺灣從此邁向新的歷史階段。自二次大戰結束直到1949年末，國民黨政府於國共內戰之中敗北，全面撤退到臺灣之前，這期間臺灣人民對新社會、新國家的建設抱持著莫大的希望，但這個希望維持不久即告幻滅。

對臺灣人民而言，二次大戰的結束，具有兩種歷史意義，一是自法西

¹ 參考王曉波，《臺灣抗日五十年》，正中書局，1997。

斯日帝處得到解放，二是回歸祖國的懷抱。如果說，前者意味著開啓了建設新社會的所有可能性，那麼，後者卻因接收政權的前現代性格，對此可能性，朝著阻斷臺灣人民參與的方向進行。戰後初期的知識分子，打破皇民化時期的灰暗、消極氣氛，重新展開積極的活動，顯露出對創造新歷史的殷切期待。此可從當時報章雜誌發行的數量，以及大部分屬於政論性質的情況中得知，² 令人充分感受到他們迫切而認真參與新歷史創造的期望心情。不過，由於臺灣回歸祖國的懷抱，意味著必定被捲入國共內戰的漩渦之中，因而，原本想要治療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傷痕，並積極參與祖國所主導的新國家建設的島內知識分子，遂感到自己的希望與期待遭受無情的打擊。

光復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臺灣社會就面臨了失業、米荒、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和生產不振等的困境，以及因此而來的經濟、教育、交通、衛生等問題。而這些社會問題的產生，主要來自公務員貪污、特權壟斷、外行領導內行等行政階層的腐敗與無能，進而導致省籍之間的關係緊張，且逐漸浮上檯面。加上，在前日本企業的國營化方面，暴露出有關人員的無能與中飽私囊之心，在其他敵產的處理及漢奸處罰等方面，也沒有完全清算到帝國主義的殘滓，使得島內知識分子對新歷史創造的熱切期待，不得不逐漸冷卻下來。接收政府雖然標榜著三民主義，但却僅止於口號，這也令島內知識分子感到相當的挫折。戰後初期的臺灣人民，在政治上既未能實現自二〇年代起一貫主張的自治，在經濟與社會上，又面臨嚴重的失衡，導致內外省之間的衝突危機日益升高。其後之民族悲劇二二八事件，以及國民黨政府全面進駐，使得監視思想體制日益堅固，讓臺灣再度面臨另一個歷史的風暴。

不過，在戰後初期，知識分子至少擁有了自由，得以規劃民族與國家

² 參考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報紙之保存現況與史料價值〉，《臺灣史料研究》8號，1996.8。

的將來，而這個自由在過去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是不可及的，因此，使得知識分子有著旺盛的參與意識，引導他們走向公共領域之中。對於民主社會的期望，從1920年代以來即是知識分子所堅持的現代精神，雖然在殖民期間現代性受到嚴重的扭曲，但他們對此理念保持一貫的態度，因此在帝國主義支配終結的當時，對知識分子而言，此理念就成爲必須加以貫徹達成的時代課題。就如在《民報》、《人民導報》、《政經報》、《臺灣評論》等報章雜誌中所呈現的一樣，不分左翼或右翼，對民主社會的期望，一直是臺灣知識分子的共同認知。

在戰後初期，以民族、民權、民生爲主旨的三民主義，被定爲國家建設及臺灣統治的基本方針，³ 因此，知識分子乃以三民主義爲準，痛批行政階層的腐敗和無能，並提出建言，反映出他們對建設民主社會的期待。而他們所期待的民主社會，就是新中國的建設，所謂新中國的建設，就是建立現代的民主國家，由於祖國當時正陷入內戰之中，因此，他們主張先建設新臺灣，再以新臺灣做爲新國家建設的基礎。

在這裡所謂民主社會或民主國家，包含幾個方面的概念。首先在確立民主政治體制方面，他們立足於三民主義中民權主義的理念，主張地方自治。「以臺治臺」的地方自治，主要透過省、市、縣長的民選，以及改善間接選舉的省、市參議員的選舉方式來達成。可見他們掌握「主權在民」爲民權主義的本質，擁護國民的四權，希望達到民主政治的實現。

憲政實施以前，爲提高民權並發揮民主政治力量，須要行使四權即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複決權，這四權的行使是政治建設的起點、建國大綱爲政治建設的法典、也就是建設上的基礎，國民

³ 在1945年10月10日的《民報》創刊詞中說：「復興我國五千年來的民族精神，完成地方自治以便實現民權的行使，企圖實業獎勵生產以便衣食住行的民生，這是國府孫總理遺下三民主義的宗旨，也是建設新臺灣的準繩。」在10月25日《新生報》第二版〈千萬人等待這一幕—臺灣受降典禮別記〉中，有陳長官勉勵全臺同胞爲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而努力的談話。

的政治知識能力充實了的時候，人民在政治地位上當然要提倡真平等和真民主，民主政治能夠順利完成，真正的三民主義才能夠徹底實現。⁴

另外，他們批評行政機關不尊重民意機關的決議，並促其重視民意機關的意見，顯示出知識分子期盼一個名實相符的政治民主體制能儘早在臺灣紮根。

近代所謂文明國家，在政治上均以民主政治為立國的目標，民主政治是以民衆為基礎。…我國是用三民主義為治國的基本方針，而三民主義建國的目標，自政治方面言，是在建立一個最徹底的民主政治。理論上可以和現代思潮的民主主義同一步驟並駕齊驅。⁵

像這樣，他們主張民主政治制度的確立，是建立文明國家，即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目標。此主張進而擴展到能督促政治民主的輿論政治，以及支援輿論政治的言論自由與司法權獨立。島內知識分子明知祖國正在進行內戰，仍然提出這些主張，是基於多方面的信心。第一、在歷經日據時期以來多方的努力爭取，尋求臺灣自治幾乎已成多數知識分子不變的信仰；第二、透過現代化，建立守法精神；第三、不同於祖國，臺灣的黨派之爭並不嚴重。由此可見，島內知識分子高度期待將臺灣建設為中國的一個模範省，並期望日後臺灣能成為現代國家的建設基礎。再且，臺灣的知識分子經歷過日帝極權的橫暴統治，從中記取了寶貴教訓，因而展現出他們對政治現代化殷切期盼之心。

關於三民主義的另一個內容－民生主義，知識分子在對社會亂象反應的同時，亦展開了具體又有深度的討論。例如，米價暴漲與食糧問題、失

⁴ 〈盼望縣市長民選〉，《民報》(1946.7.20)。

⁵ 〈尊重民意機關決議〉，《民報》(1946.7.21)。

業與救濟工人、經濟破產與通貨膨脹、糖業振興與農業經濟的建設、國營企業與交通問題、納稅的公平、市內房屋問題等有關人民衣食住行的議題，佔去了大部分的報紙篇幅，這些內容一方面批判政府的行政能力不足，同時也指出解決問題的方向。

從外國的新聞和國內的報紙中，最近發現不少批評本省的文章，指責得最厲害的，都認為本省工業陷於停頓，失業人數一天天增加，商業受統制過嚴，臺灣人的商業資金找不到出路，因此物價飛騰，社會不安，這些報導無論是否正確，值得我們注意。…生活第一，我們談三民主義，切不要忘記民生主義，生活的改善，是此戰爭以後全世界人民的要求…問題很明白，民生問題的動盪決定政治的形態，民生是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他一切是表象，在國際如此，在國內如此，在一省之內又何嘗不如此？…民生第一，人民最現實祇要有工做，有生意做，有飯吃，求最起碼的溫飽，他們就會焚香祈禱，感激零涕，政治的好壞，這是最有力的考驗。⁶

以美國、英國、蘇聯等國家為例，指出臺灣的民生問題。他們的基本立場是將民生的安定當作民主政治的根本，當作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基礎。民生問題中最為嚴重的就是米價與失業問題，以及由此衍生的治安問題，因此，討論這些問題的社論頻頻出現。

勝利和光復的報酬如何？反而被拋出「職業圈外」，打碎了飯碗。…為什麼失業的問題今天特別嚴重？我們不能不指出：這是接收期間許多會社解散的結果、這是許多工廠停工的結果、這是許多外地的兵員回來的結果、這也是許多戰時工業以至手工業被炸或被迫不得不轉業的結果。這些結果，有的是戰時的、有的是入了和平時期必然發生的。但我們也必得承認：在許多地方，我們未有盡人事，也加強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失業問題，不是個人的吃飯問

⁶ 〈民生第一〉，《人民導報》(1946.5.3)。

題，而是社會問題，這是常識線上的理論。今日的臺灣，竊案特別多，治安特別有問題，甚至至白晝亦有持械入室者，已不能說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而失業問題所埋藏下來的炸藥，已經是漸漸在爆發、在擴大。在今天，這一嚴重的問題，我們已不能忽略下去了。這裏，我們以人民導報的聲音喊出四個字：「救濟失業！」如何救法？我們認為：這一定要有政府的力量，作通盤的打算，我們不能像美國那樣作出「充分就業法案」，但至少也要有一個計劃，謀取問題的解決。在今天的臺灣來談救濟失業，再沒有使接收或未接收的工廠趕快開工來得重要來得急迫了。工廠多開工一個，便吞納一些工人，這道理很明顯，一面喊救濟失業，一面讓工廠的馬達在廠房裏睡覺，無論如何是過不去的。此外，本省公務人員與技術人員之重新調遣分配，這也是一件值得考慮的事。願當局加緊為之！⁷

提出失業原因及解決方案的同時，再次強調失業問題的解決乃是燃眉之急。

現在的糧政對策僅限制生產地的搬出辦法，而於消費地全無講究人為的調節辦法，使糧商自由自在操縱米價，致使一日之間，米價波動數十回，而且漲落甚不合理。故欲調節米價，於消費都市宜創置實米市場，依法蒐集糧商於一定場所交易，糧政當局可每日調查出入米及存庫米，對交易米價的變動亦可查察實情，而糧商於衆合市場交易，要受民衆監視，而依有無相通的經濟法則，米價比較自由放任，似可達成調節的功効。⁸

這篇社論中，提出採取實米市場，加上行政機關的適時監視，作為米價安定的對策。隨著民生問題的日益惡化，各報紙都強烈批判當局，並從多方面加以分析原因，其中，官僚資本主義被指為經濟惡化的主要禍根。

⁷ 〈救濟失業！〉，《人民導報》(1946.1.17)。

⁸ 〈再檢討糧食政策〉，《民報》(1946.8.23)。

政治及經濟組織未上軌道的國家，一味強化國營事業，往往要惹生矯角殺牛的弊害，過去官僚資本發生的歷史可證明。試舉數例：一、官僚個人竊取國家社會的錢財，而投資商業或投機事業。二、商業或各企業每藉官僚參加，得以假公而討便利。三、官僚經營的公共事業，居多巧用移花接木的方式，變公為私。四、官僚善於敷衍，慣於扶直勢力，牽親引戚，以蠶食公營事業。五、以官僚的態度，盤踞生產機關，坐吃生產資本。六、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美名，剝奪人民資產，以滿足官僚的支配慾。這幾種叫作官僚資本主義的弊害。簡直的說，這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官僚發財主義。⁹

早在六個月以前，爲了儘早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同樣是在《民報》的社論之中，就曾呼籲以國家主導的方式育成民族資本，進而認定專賣局、貿易局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乃至支持國營事業。¹⁰ 然而短短數個月之後，卻轉變成否定國營事業的看法。那是由於大部分的敵產雖然歸屬於國營、公營事業，但是在官僚與買辦資本的相互勾結下，弊端百出。因此，不用說是累積新國家建設所需要的民族資本，就連一般民衆的支持也都失去。當時知識分子普遍認爲，在過渡期優先發展國家資本主義，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基礎，但面對官僚資本主義的弊害日益嚴重，民衆的生計陷入困境，他們逐漸對由國家主導，以資本家階級爲主的現代化，表示懷疑。當時絕大多數的報紙，在不斷提出有關民生現況與改善方向的同時，不忘提出民衆的教育問題，可見他們所認識的民生主義，是從讓民衆脫離經濟貧困開始，進一步發展到培養現代國家的國民資質教育方面。

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化—民權主義，以及經濟上的民主化—民生主義之外，有關另一個三民主義的內容—民族主義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消除日本殘滓及中國化上面。而具體的方向，除了消除日本式的生活習慣、日本話的廢止以外，透過國語的普及、書籍的輸入、文化促進會的成立、雜誌的

⁹ 〈公營事業要民主化〉，《民報》(1947.1.23)。

¹⁰ 參見〈專賣、貿易兩局的存廢〉，《民報》(1946.9.20)。

發刊等，主要將重點放在介紹祖國的文化上。不過，當時將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定位在臺灣人民的中國化上，中國文化成爲當代的論述；加上自認爲堅持中國文化者，大部分是從內陸遷移過來的官僚階層，他們以中國文化素養的不足爲藉口，抑制本省人的就業或昇遷，甚至懷疑本省人的自治能力，因而逐漸形成社會不均衡，也造成內、外省人之間的意見衝突與情感隔閡。透過《民報》的社論〈中國化的真精神〉，探究當時中國化的進行狀況：他們認爲「光復了的臺灣必須中國化」乃天經地義之事，在社會上所進行的各種中國化工作也是必然，因此他們對中國化的原則表示贊同，但是對於具體的進行方向，提出了下面的意見。

第一：國內現在的習俗思想，未必全可以爲我們的模範。某些社會賢達，經已指出現代中國人的生活，爲污穢、浪漫、懶惰、頹廢，必須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的原理改進，…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本省須要推行的所謂中國化，不是現在的國內社會生活狀態，而是新生活運動以來所志向的原理。第二：固然日本統治以後所發生的習俗思想中，有違背三民主義的，必須徹底地剪除，但其中亦有若干要素，是法治國的必須條件，在最低程度的文明社會，亦所不可缺的。比方守法的精神社會公德等。這些不但不可使其消滅，而且必須積極地促其光大。…在這原子彈的現代世界，規定我們的行動的根本原理，是積極其明瞭而容易理解。我們的國家民族，要不能改進發展則只有亡種滅族而已。無論在本省或者外省，我們的生活改進的目標，應當是在於如何達到富強的國家民族的生活。若是配合著這個目標，無論它是英美的，或者是日本的，都應當攝取而活用之。若是違背這個目標的，無論它是數千年來的道地中國傳統，也必須把它打破剷除。這才可以說是真正的進步的三民主義中國精神。這才可以說是在本省要推行的中國化的原理。¹¹

可見他們最重視的，就是抑壓個人利益，提高民族利益，以抵銷外人利益

¹¹ 〈中國化的真精神〉，《民報》(1946.9.11)。

的民族主義，他們認為這是新生活運動以來所志向的原理。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指的不是回歸傳統，也不是祖國的現實生活狀態，而是一種建設現代國家所須要的守法精神、社會公德精神，它具備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的原理。每一個國民都要守秩序，政府也要用必要的手段，例如正確的戶口調查等，來鞏固建設現代國家的基礎。如此重視大家一起準備現代法治國家的到來，是中國化的要點。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將中國化理解為國家現代化的一個部分，他們對新時代的創造、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即祖國的現代化，持有強烈的熱望。

有關中國化的這些基調，在從內陸過來的進步人士身上，也同樣看得到。例如，為了內陸人和島民之間的文化交流，以大陸人士為主所組成的半民間團體『臺灣文化協進會』，在其發行的雜誌《臺灣文化》中，就刊載了魯迅特輯。¹² 衆所皆知，魯迅的小說以解剖中國人的封建劣根性為主要內容。此外，除了以純學術觀點介紹古代思想外，大部分都是介紹從五四到抗戰時期的現代思想、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學。

由是，戰後初期的臺灣知識界，期盼把目標訂在以三民主義為主要依據的現代國家建設上面。因此，他們將三民主義的內容，解釋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民生第一主義，以及建設現代國家所需國民精神的培養要目。這些都反映出從日據時期以來，在接受啓蒙主義現代思想的同時，努力維持傳統民族精神的臺灣知識分子，在脫離帝國主義的支配後，面對極可能建立現代國家的時代，所展現出對現代性的堅持。

(二) 重新追求普遍的現代價值

迎接光復的臺灣知識分子，除了呈現出上述有關建立現代國家的熱切

¹² 《臺灣文化》一卷二期(1946.1.1)為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

期望外，同時還重新追求基本人權、科學技術，以及反封建等普遍的現代價值。首先，在基本人權上面，他們不僅重視身體、居住、言論、出版、結社和信仰的自由等個人自由權，還包含政治權與公民權。解放提高了民主政治實施的可能性，因此，他們進一步著眼於人民的政治權利。所謂民主政治，就是指人民擁有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免權等政治上的平等權，而這些政治權和公民權正可充實人權的內容，最後發展為經濟上的平等權—社會權，這樣才能達成基本人權的確立。由於中國受過幾千年的專制壓迫、半殖民地、封建社會規程的束縛等，人權處於方始萌芽到成立的階段，因此，臺灣知識分子認為在政治和經濟，乃至社會建設上，臺灣背負著建立尊重「人權」，實現完全人權的使命。¹³ 可見當時的人權思想，已經超越個人的基本自由範圍，而在國家、社會的範疇內加以討論，也可看出普遍現代價值的主張，正受到建立現代國家這個時代課題的影響。

另外，反封建精神也持續受到重視，他們為了國家的發展，提出社會各方面的改革主張，其中還特別強烈批判了官僚的封建性。

總而言之，我們祖國不是神話的國家，但比較英美列強，政治、經濟、科學、教育各部分均落後，若不奮起改革，豈能追隨？為國家發展上，全省同胞須要團結，對政治、經濟、生產、教育，均要發揮全力量來改革封建的惡作風，以樹立新鮮而有勇氣的新興作風，能如是，臺灣才有出路。¹⁴

政府預算是依法律編製實行，不許自由開鎖，這是根本原則。然而未確立真正民主國家的政府，往往不能脫離封建的惡作風，無視法令擅行支出不以為怪。由一個行政首長，能夠自由撥配預算，不消說，是表示封建性政治的殘渣還沒掃除。¹⁵

¹³ 宋斐如，〈論臺灣基本人權〉，《人民導報》(1946.3.17)。

¹⁴ 〈臺灣的出路〉，《民報》(1946.8.19)。

¹⁵ 〈預算與物價〉，《民報》(1947.1.31)。

因為本省沒有封建基礎，所以從外省搬入的壞種子，亦不易生枝發葉，成爲一個組織；現在我們所見的，不外是「封建」作風而已。而這個作風，在慣于法治生活的本省同胞，卻惹出了非常強烈的反動。牽親引戚，成群結黨，以一個機關爲地盤，無論是非曲直，「打折手骨卻屈入不屈出」，這就是封建作風了。¹⁶

他們將封建性定義爲利己主義的思考，¹⁷ 以及現代法治精神的不存在；因此，公務員的貪污與一般民衆的不守法，都是封建行爲，而這也表示這種人民尙未具備現代國家的國民資格，必須作爲消除的改革對象。

在反對封建性的同時，他們也重視科學精神。這裡的科學指的是從啓蒙時期以來即所強調的脫離神秘及客觀認識事物，主張萬事均須依據邏輯性思考來進行分析，並從批判的角度，把握現象與本質的精神。

光復以來誰都懂的非提唱注重科學不可。可是不少人士尙未能十分了解它的真義。譬如學習物理化學，而應用於製造生產事業，不錯是科學的一方面。但這是科學的學習或是模倣而已。我們所盼望的是理解科學的精神原理，而以論理的經濟的精神應用於日常生活…能達到這田地，才配說開明的社會，同時也才得居處於原子彈的現代世界，不至爲跟不上潮流的落伍者。¹⁸

現在我們國民當前應有的努力是什麼？是國家的統一，是民主，是和平，是科學。¹⁹

這些知識分子所主張的「論理的精神」，就是現代哲學的認識論基礎，強

¹⁶ 〈掃除封建作風〉，《民報》(1947.1.16)。

¹⁷ 〈利己主義與新建設〉，《人民導報》(1946.3.18)。

¹⁸ 〈確保我們的科學精神〉，《民報》(1946.9.19)。

¹⁹ 〈人民團體的活動〉，《民報》(1946.8.9)。

調對事物的理性判斷，認為這些邏輯精神應當成為日常生活的基礎。他們認為科學思考、理性判斷，以及依據法律的行動規範，是建設開明的社會與現代國家的國民所必備的要件，因此，缺乏此種觀念者，即應被批評為具有封建性。²⁰

另外，他們認為和平是所有現代價值得以實現，並得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現實基礎。他們注意到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情勢，美蘇兩國的對立局面日益明顯；對此一情勢的發展，他們都深表憂慮，同時也強烈希望內戰能夠終止，因此，他們遂提出了和平主張。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對立，來解釋二次世界大戰的他們，當然認為大戰終結，反法西斯主義陣營得到勝利，接著而來的應當是和平。但實際的國際情勢，卻發展成美蘇兩大強國的對立，以及中國內戰遲遲未能結束。隨著美蘇對立架構的鞏固，日本重新武裝的可能性也節節升高，他們對此表示憂慮。而且，對同樣剛脫離殖民統治，背負著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朝鮮情勢，也表示同情與關懷。這些均反映出戰後初期的知識分子，對戰爭的厭惡，以及希望各民族能自由選擇自我民族的出路，以達到真正的和平。對剛脫離法西斯主義的統治，迎接解放的臺灣人民來說，和平是必然的要求，而這個要求來自於只有和平才能建立現代國家與民主社會的信念。

昨天是全世界最有意義的一天也是歷史上劃時代的一天。有關今後世界永久安全的聯合國大會，昨天在倫敦開幕，有關今後我國奠定民主政治基礎的政治協商會議，也於昨天在重慶舉行。這兩個會議，在舉世要和平舉國要求民主的緊張空氣中，竟然能夠順利的召開，這不僅是全世界人類的幸福，也正顯示著我國國運前途的光明。²¹

²⁰ 參見〈嚴辦貪官與實施自治〉，《民報》(1946.9.16)。

²¹ 〈聯合國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人民導報》(1946.1.11)。

從昨天起，世界上有兩件大事值得大書特書，一件是國人期待已久的政治協商會議，已於昨天開幕，一件是世界和平機構——聯合國的組織，也在昨天誕生。這兩個會議都是爲了和平，爲了防止戰爭。²²

對於內戰，他們主張先要兩黨協商，訂定停戰協議，並持續進行協商，以達到戰爭終結的目的。而在國際情勢方面，他們目睹聯合國會議的成功，滿心期待能防止二次大戰之類的世界性戰爭再次發生，以確保永久的世界和平。他們以開放的視角，接受各種理念共存的現代世界與各國情勢，相信透過理性、邏輯精神和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就能決定屬於自己的現代國家形式，反映出知識分子對現代價值的堅持。

在真正現代化的民主國家，一切的社會變革，都可能以和平公正的手段期待實現。換言之，就是不必用槍桿，不必用強力，而以全治的方式，用言論和投票，用國會的爭論，而獲得人民，獲得政權，實現一切驚天動地的大變革。²³

就如同法國的國會透過選舉獲得成立，並且堅持不同理念的左右政黨得以共存一般，他們也希望中國的政治能以此種模式，先確保國內的安定，最後完成建立現代國家的目標。可見當時無論對國際或國內情勢，他們都很重視以非戰爭的手段，透過協商、會議等政治手段來解決問題，而和平正是伸展政治手段的前提。

綜觀上述戰後初期知識分子所主張的內容，我們明確知道無論在現代國家的建立，或現代普遍價值的追求上，他們都非常重視民主主義原則與批判精神。這就證明從二〇年代接受啓蒙主義以來所堅持的現代性，在新

²² 〈兩件大事〉，《人民導報》(1946.1.12)。

²³ 〈法國選舉的教訓〉，《民報》(1946.11.18)。

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

的歷史階段，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二、民族認同與現代國民形象的建立

(一) 中國化、去日本化與省籍衝突

脫離異民族的殖民統治而獲得解放，使得臺灣邁入新的歷史階段，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及實現民主社會的可能性亦大增。其實踐的第一步，必須先除去半世紀之久的日本統治所遺留下來的毒素，重新找回中華民族的自我認同。知識分子共同表示要清算日本殖民統治的遺毒，並以認識祖國才能培養出健全的國民作為首要的時代任務。

大多數的臺灣同胞受盡了日本奴隸教育，他們中間大部分已成了「機械」的愚民，而小部分已成為極危險性的「準日本人」，我們要用怎樣的方法，在最短時間中去喚醒去感化這兩批的同胞，使他們認識祖國，使他們改掉「大和魂」的思想，成為健全的國民，使他們能夠走上了建設新臺灣，建設新中國的大路去。²⁴

首先，過去的臺灣文化受到日本式文化的影響很大，同時也可以說已達到世界性水準。其次，臺灣文化的現狀與中國漢民族文化比較起來，仍然有許多地方還未中國化。今後要進一步加以擴充和推進。與中國文化比較，若尚有不合適的地方，就有必要加速進行正面意義的中國化。比較上來說，外省人並不理解臺灣文化早在過去就達到世界水準。同時，對於尚未中國化的部分，今後我們應努

²⁴ 林萍心，〈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給臺灣知識階級〉，《前鋒》創刊號(1945.10.25)，轉引自趙遐秋、呂正惠主編，《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頁159。

力使它符合中國文化。²⁵

可見他們認為恢復中國民族的精神才是首要任務。除了這些雜誌，《民報》也在創刊詞中，首先提出「復興我國五千年來的民族精神」，呼籲國人依據三民主義建設民主國家；《人民導報》在發刊詞中也提到，現今的臺灣雖然已建立了物質文明，但是上層的精神文明，由於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以及奴化教育的實施，並沒有得到正途又合理的發展，不過，因「臺灣文化還承續著漢明的正統」，只要把因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壓抑而步入的歧途校正過來，並著重啓蒙、發揚、溝通，很快就能步入正途。²⁶除了這些以臺灣知識分子為中心的言論媒體，極力鼓吹民族正體性的確立之外，官方的代表言論《新生報》也主張「以中國化發揚自己的民族精神，肅清奴役臺灣人的『皇民化』」，²⁷具體提出把日本在建築樣式、店名招牌、應用文字、一般稱謂等方面所遺留下來的影響，以及在語言文字、圖書雜誌、小說電影中蘊含的大和民族主義和頌揚軍國主義的謬論等皇民化毒素，徹底的掃除。²⁸

除去日本文化的餘毒，以及強調民族認同的恢復，是長時間對抗異族統治的臺灣人民的自我認知，也是即將到來的現代民族國家國民所必備的基本條件。可惜的是，不久之後，這種期許卻變成了針對行政機關統治形態的對抗，進而發展為民族分裂的導火線。其原因不外是封建的官僚體系及內戰的影響，同時光復後景氣急速的消沉，民生問題日益嚴重，因此，知識分子的筆鋒也逐漸離開民族正體性問題，集中於社會問題上面。

光復一年半的臺灣，經濟情勢卻異常可悲，政治不能上軌道，產

²⁵ 這是黃得時的話，參見《新新》7期(1946.10.17)。

²⁶ 參見《人民導報》發刊詞(1946.1.1)。

²⁷ 〈建設臺灣新文化〉，《新生報》(1945.11.5)。

²⁸ 〈肅清思想毒素〉，《新生報》(1945.12.17)。

業的復興不進，接收工廠大半停頓，失業者日漸增加，物價暴漲不息，財政不能確立，仍靠增發紙幣維持。眼見大多數的人民生活困苦難堪，民生安定至今只是模糊的遠景。過去一年半期間，專注意接收日產，對民生安定拿不出整套有效的辦法來。因此人心惶惑不定，對於未來抱著無限的憂慮。²⁹

如引文所述，國府接受臺灣，僅只一年，社會上出現最嚴重的現象，就是民生的極度不安定；而民生問題容易引起社會的動盪不安，因此知識分子對未來感到一片暗澹。在物價暴漲、產業麻痺、失業增加、教育荒廢、治安危機等社會情況之下，大多數民衆的生活得不到安定，因此想要累積國家資本，建設現代國家，只能說是一場遙不可及的渺茫夢想而已。從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開始，即對政府持續提出建言與批判的臺灣知識分子，眼見社會問題不僅得不到改善，反而有持續惡化的迹象，遂開始積極尋找原因，並謀求具體的解決方案。如上所述，他們明確地指出官僚資本主義為經濟惡化的原因，而當時的普遍認知就是官僚階級即外省人，因此，起於不滿民生問題、對官僚不滿的情緒，就擴大成為省籍之間的緊張與衝突。

在此，藉由《民報》的社論和報導來探究戰後初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即可看出臺灣人言論媒體對此所持的角度，以及有關省籍衝突、族群對立的情況。當時，政治方面的最大問題，就是接收委員利用職權貪污的腐敗情形。

臺胞們最討厭的是貪官污吏。日前本報檢舉關於專賣局的貪污醜聞事，是誰都喝采稱快的。…牽親引戚，營私舞弊的腐敗政治，臺胞已討厭了，封建性的包辦政治是更討厭的。³⁰

²⁹ 〈如何建設臺灣經濟〉，《民報》(1947.1.6)。

³⁰ 〈嚴辦貪官與實施自治〉，《民報》(1946.9.16)。

光復當初，臺胞們的熱烈興奮，也是因為待望祖國的懷抱，而情不自禁所致的。老實說：重新相逢的祖國，是使我們失望得很，祖國的政治文化的落後，並不使我們傷心，最使我們激忿的，是貪污舞弊，為廉無恥。³¹

據當時報載，由於接收委員、貿易局或專賣局職員、學校老師、高等法院檢察官等趁職權之便中飽私囊的事件，時有所聞，使得本島人對外省人官僚的不滿，日益加深。另外，從內陸來的人士壟斷政府要職及權位的現象已然形成，而在殖民時期不斷抗爭日本支配，並熱望建設現代國家的臺灣知識分子，却逐漸被排除在創造新歷史的可能性之外。臺灣人之所以遭到排斥，是被認為不諳國語文，以及缺乏有經驗的政治人才。例如當時民政處長周一鶚就說：「不會講國語，不能寫國文，就缺乏國家觀念，沒有國民精神」；針對這個說法，《民報》在社論中提出「不消說，對於推行國語、國文的學習，我們是不反對的，對於正當的國民精神的提倡，我們也是不反對的。只是對於意識地，或是不意識地忘卻方言是『民族魂』的事實，藉口『國語』的未普及，而要阻礙民意，摧殘民權的企圖，我們是要徹底的抗爭，要徹底的排擊的！」³² 可見他們是以民主國家的國民應有的權利概念來對抗本省人被排斥的不公平現象。官方的《新生報》也提起「就本省人來說，由於過去日人統治專橫，今日有經驗的政治人材實感缺乏」，而新生報社長李萬居也說：「本省受日本壓迫五十年，現在缺乏政治人才」，³³ 要求臺灣人要「緊握時機，祛除自滿，虛心學習」。對此《民報》也提出反擊：

少數特殊階級的根本思想，本來是在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³¹ 〈祖國的懷抱〉，《民報》(1946.10.26)。

³² 〈「國語國文」與國家觀念〉，《民報》(1947.2.8)。

³³ 參見1947年1月3日的社論。

知之」。…他們內心是在夢想永遠騎在人民頭上，永遠做人民的統治者。所以要站在高台上，向人民命令：「你們沒有人才，你們要好好的學習」…其實他們還有一句最重要而不敢公然說的話，即：「所以應該我們來統治你們」。…現代是人民的世紀，政治不是不可思議的了不得的東西。真正的政治人才應該是來自民間為人民服務。耍花樣、玩權謀、對上峰獻媚，對人民欺矇等等，這是封建時代的「高度政治技術」，可是我們不必學。³⁴

也是以現代民主主義政治的主權在民觀念，來對少數階級的獨占權力心態提出抗議，並批判封建性的官僚政治。而且獨占權位的外省人官僚不但自己腐敗，還牽親引戚，壟斷權位和國家資源，這些以人際關係為主的封建性包辦政治，使原本希望建立現代法治國家的臺灣人民，感到無比的挫折與憤怒。如此的權位壟斷、牽親引戚作風，在交通事業、糖業、警界等所有公營事業上，形成外行領導內行的荒唐局面；例如，在交通事業方面，「不守經濟原則，以專制的方式採用多數全無經驗的人物，致經費膨脹，其責任全歸貨客負擔」；³⁵ 在糖業方面，「因辦公人員貪污行為百出，加上各製糖廠的負責人員，多任用沒有糖業經驗的外省人，致使蔗糖農對植蔗的前途發生憂慮，不肯信用製糖廠，因此原料甘蔗的增產變成僵局，無法打開」；³⁶ 在警察界也引發「各地配置的警察職員，因第一線及縣市區的幹部，多登用不熟識本省實情的年少無經驗的外省人，語言不通，而且少有責任感的，其中尚有一部分的貪污分子介在，老百姓對治安機關，全無信賴」。³⁷ 這種狀況，對已接觸過現代化，並在重視效率、能力及責任意識的現代性認識基礎上，懇切希望創造民主國家的臺灣人民而言，簡直是開歷史倒車的局面。換言之，這種狀況被認為是，連根破壞日據時期臺灣知識分子努力

³⁴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民報》(1947.2.2)。

³⁵ 〈要急整備交通機關〉，《民報》(1946.11.6)。

³⁶ 同前注。

³⁷ 〈治安問題嚴重極了〉，《民報》(1946.10.16)。

爭取的現代法治的基礎，因而他們對此提出的警示與批判，甚為嚴厲。當時不守法規、法紀不彰的情況，是從基層行政機關至行政公署的長官，不分職位高低的普遍現象，³⁸ 此一現象不僅形成治安上的紊亂，甚至形成剝奪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而一般民衆即使不相信官僚體系，也沒有管道反映民意。

瀰漫腐敗與貪污的行政體系，自然地形成官僚資本主義，由此造成經濟蕭條、民生凋蔽，加上對公營事業、專賣事業的政府統制日益加深，通貨膨脹、稅賦加重、物價暴漲、米糧短缺等民生桎梏，已到了忍無可忍的臨界點。

囤積居奇的奸商，化公為私的貪官污吏，榨取血汗的資本家都在天國享用，反之，爭不到米吃的人逐日增加，乞丐一天多過一天。總之，今天老百姓的最大痛苦，是高物價化失業。

為政者須要細心，聽之無聲，看之無形，人民之痛苦，能呼籲喊救，尚可得而補救之，至若喊不出聲的痛苦，其爆發之烈也，有不易猜測之處，可不戒哉！³⁹

這幾日來，黃金美鈔的奔騰，一日數獎(漲)，殆無從預想其止境，百項貨價，也跟著漲風扶搖直上。民生困苦，莫甚於此。尤其是米糧的獎(漲)價，老實叫非富裕階級的老百姓，要活不下去了。⁴⁰

不僅如此，米糖搬出大陸，政府獨占支配利益，大陸的景氣蕭條波及臺灣等經濟惡況，雪上加霜地影響了臺灣民衆的生活，加上省籍間的緊張加深，終於爆發了二二八的民族悲劇。因此，戰後初期的時代精神，也就是經由去日本化與中國化，來達成民族認同，進而確立現代國家國民形象的

³⁸ 參見李筱峰，〈從民報看戰後初期臺灣的政經與社會〉，《臺灣史料研究》8號(1996.8)。

³⁹ 〈老百姓的隱痛〉，《民報》(1947.2.10)。

⁴⁰ 〈面臨經濟危機〉，《民報》(1947.2.14)。

期待，迅速發展為陳儀政府與被他們指為奴化的臺灣民衆之間的衝突。

其實，去日本化與中國化，有如銅板的兩面，是互相分不開的概念；由於其後政治因素的介入，以及省籍衝突的加深，其解釋另有思考空間。但是，端看當時知識分子的說法，即知其目的不外乎培養現代民族國家國民應有的資質。當時在臺灣活躍的大陸進步人士王思翔，將政府所主導的排他性中國化，命名為「惡性的中國化」，提醒這種中國化很可能把臺灣陷入惡性狀態；臺灣知識分子蘇新也主張朝向具有正面意義的中國文化轉型，並批評當時假中國化之名，壓迫臺灣社會的情況。⁴¹

(二) 民族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國民形象

萌芽自反對前現代封建統治勢力的省籍對立與衝突日益加深之際，臺灣人民被貼上受到日本奴化，缺乏民族精神的標籤，造成臺灣人民在具備現代國民的正體性上受到質疑；知識分子因此為本島人的民族認同極力辯護，並提出臺灣人民主體性的議題。

臺灣既為吾國的版圖，而今在脫離了五十一年之宗主權以後，光復歸來，那末臺胞當然是祖國構成成員中的一員！這是常識的問題，寧待深論？⁴²

此乃針對在殖民問題的處理過程中，將留在大陸的臺灣同胞，強制歸鄉的態度所提出的議論，這篇報導認為這是政府不把臺胞視為國民的政策，同時主張若是此種政策果真落實，那麼在臺灣的所有大陸人，也應該離開。在這些破除臺灣人與大陸人之間差別待遇的主張中，包含了臺胞也是祖國

⁴¹ 參見《新新》7期(1946.10.17)。

⁴² 〈再談「臺胞」的身份〉，《人民導報》(1946.1.15)。

的一員，而且根本無須質疑的看法。在《民報》中也有關於臺胞國家觀念的社論。

臺灣即使光復了，我們臺胞再投入祖國的懷抱了，對於「國家」的觀念，絲毫沒有動搖，對此現實，任何人亦不能否認的國民學校的課文寫著「我們是中國人，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可以說臺灣人就是中國人，中華民國就是我們真正的國家，同時為國家的一份子，對現在我們國家的情勢，亦感覺著任重而道遠。我們既有不折不扣的國家觀念，那末對於我國情勢，當然不得不抱絕大關心，實不容取傍觀的態度，重複說，「因為中國是我們的國家」，對於酷愛國家的觀念，我們相信臺胞絕不讓任何外省同胞希求我國在世界上能夠名實相符為四強之一，這個願望亦不遜於任何外省同胞，所以我們希望臺胞尤其是青年們，負著重大責任青年們，更加一番的努力。⁴³

同樣的，對於臺胞被統治勢力指控為缺乏愛國心、缺乏國家觀念的評價，提出反駁，並強調臺胞也是堂堂中國國民的一員。由此可以看出，臺灣人民在回歸祖國懷抱的同時，被認為身具日本餘毒，因而被排除在創造新歷史的可能性之外的心理挫折。堅持與祖國同一立場的臺灣知識分子，在當時一面倒的介紹中國文化的氛圍中，找出被忽略的臺灣歷史和文化，力主應加以研究。⁴⁴ 我們從早期成立的臺灣人綜合性雜誌《新新》，以及以促進大陸與臺灣之間文化交流為目的的『臺灣文化協進會』的機關誌《臺灣文化》中，均可看到具體的成果。《新新》主辦有關臺灣文化前途的座談會，參加者有蘇新、王白淵、黃得時等人，探討促進臺灣文化的方案，以及臺灣文化應走的方向。而共發行二十五期的《臺灣文化》，多次刊載有關臺灣文學、社會、史料的介紹，例如，楊雲萍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呂

⁴³ 〈我們的國家觀念〉，《民報》(1946.7.3)。

⁴⁴ 〈對臺灣大學的期待〉，《民報》(1946.9.30)。

訴上的〈臺灣演劇改革論〉、李石樵的〈本省文化消息〉、王白淵的〈臺灣演劇之過去與現在〉、陳紹馨的〈臺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與〈臺灣史料的整理〉，另外還有介紹臺灣民謠，批判對臺灣文化偏見的文章等，⁴⁵這些主張要研究臺灣文化、臺灣歷史的文章，都是以臺灣與祖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作為基調。

因此，知識分子從臺灣人的身分確認，到臺灣歷史、臺灣文化的探究，逐漸確立臺灣人的民族認同及主體性。無論是臺灣人還是大陸人，他們都予以重視，並視其為具有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熱情的民族成員，努力化解族群對立和省籍衝突。他們主張既然是同一民族的成員，那麼先要消除潛伏在一般民衆之間的內、外省人的隔閡，然後彼此團結合作，邁向新的時代。

過去一個年的中間，因國共的糾紛未能解決，內戰不息，建國工作免不了有遲遲不進之感。加之，軍、政以及各機關團體，奉公守法之精神有虧，社會風紀弛緩。恃強凌弱，一樣同胞裡頭，自分優劣互相敵視。貪污盛行，人心激忿而不平，意氣消沉而萎靡，舉國滔滔者皆是，並無例外。臺灣也是一樣的現象，只減了國共分爭的痛苦，略堪自慰。

際此國慶佳日，我們應該滿足喜歡享受光復的幸福，舉六百五十萬省民，和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齊聲慶祝有光輝的雙十節，期望發展國威，光揚民族，為百年大言，建設富強康樂的國家。但是理想和現實相去甚遠，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用著明朗的心情，懷抱希望，樂觀將來，發生勇往邁進的精神，努力協助以民為本的政府，建設新中國，建設新臺灣。⁴⁶

將日本留下在臺灣的好處：清潔、整齊、幽雅，保留下來，將她的毒菌雜草掃除乾淨；狹隘的思想、自大的觀念、歪曲宣傳等一

⁴⁵ 〈也漫談臺灣藝文壇〉，《臺灣文化》二卷一期(1947.1.1)。

⁴⁶ 〈慶祝三十五年雙十節一併紀念本報一週年〉，《民報》(1946.10.10)。

一給予擊破揭穿。使臺灣同胞代價明瞭，我們今日所站的地位，所處的世界，而建立偉大的觀念，寬闊的風態；一面宣揚中國固有的美德，一面補充我們的不足。希望在臺灣建立一個養護的風氣，美麗的文化，做為中國新文化的基點，來發揚中國悠久偉大的文化，增光我們這歷史。臺灣的人文和環境以及設備等等的客觀條件，都是給我們很大的希望和可能，深盼全國同胞協助我們，給我們勇氣，來和代價共同努力，建設新中國的新文化。⁴⁷

可見他們已達成共識，無論外省人或內省人，摒除各自的先入偏見，團結成一個民族，解決現實的問題，才是一個準備即將到來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民應有的形象。這個時代性任務，自然導出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的、民主主義的、進步主義的現代國民形象。

回顧我國眼前的現狀，雖然抗戰勝利，但是和平建國的前途，相距甚遠，外患雖解，面內憂尚不能除，是以有識者尤其是我們臺胞青年們，豈可安閑坐視，取袖手傍觀之態度。

我國今日雖列在五強之一，但是在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科學各方面無不落後，現在尚未能踏入和平建國之大道，怎能建成一個名符其實的強盛國家，二次誰敢保證我國再不被敵人的侵略。

在此，我們很希望當局者，必以國家之憂為己憂，為國家將來計，務須去小就大，為國家為民族，莫固執過去的成見，努力奮鬥，早日完成真正的國民革命。⁴⁸

他們強調現代國民要具備能敏捷應對世界情勢的民族主義傾向，以及以現代國家的建立為最優先任務的國家主義成分；此外，為因應民主主義，必須能夠表達意見，並且排擊所有封建的前現代思想，同時具備科學、效率、責任和法治觀念的國民形象，如此才是不分省籍的進步國民形象。

⁴⁷ 游彌堅，〈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臺灣文化》二卷四期(1947.7.1)，頁1。

⁴⁸ 〈莫只陶醉勝利〉，《民報》(1946.9.3)。

可惜這些希望與期待，由於內外省人之間的緊張與衝突、民生問題的惡化、社會的全般性退化，以及歧視性文化政策的實施，而終究得不到正面發展。緊接著，政府對臺灣人民的改革要求，以「陰謀叛亂」的口實來應對封殺，以致爆發了二二八民族悲劇。衆所周知，二二八事件造成了雙方衆多的犧牲者，也對以後臺灣的發展，帶來根本又長期性的影響。事件發生之後，《民報》、《人民導報》、《政經報》、《臺灣評論》等報章雜誌遭到廢刊，政府對知識分子的思想壓制也逐漸強化。因此，從日據時期開始，堅持無論文化啓蒙、社會主義，或保守右翼的民族主義立場，從而展開抗日運動，希望建立現代國家的本省知識分子，以及光復後來臺的大陸進步的知識人，或被逮捕，或遭殺害，或逃亡匿跡，⁴⁹ 全面自歷史的舞臺上消失。這樣的情勢發展，經過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實施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更形強化。因此日據時期臺灣的反帝國主義的、反封建的、抵抗的、批判的精神，以及戰後初期被強調的民主、科學等現代精神，無法延續到下一個世代，造成嚴重的斷層現象。也就是說，從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全面進駐臺灣，以及其後在反共抗俄的理念與鞏固既有體制的前提下，所實施的經濟發展政策，是朝着扭曲戰後初期臺灣人民的期望－建立以民衆爲中心的民族國家，以及對自由民主的熱切期望－的方向進行。

第二節 戰後初期的文學理論與現代性

一、戰後初期的文壇狀況與臺灣文化的重建

⁴⁹ 參見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第九章，《聯合文學》197期(2001.3)，頁163。

從二〇年代的新文學運動以來，一直站在民衆和民族的立場，堅持著現實主義傾向的臺灣文壇，迎接光復的到臨，面對嶄新的歷史，展現出活潑的氣象。日據統治一結束，臺灣文人重新收拾文壇，並展開積極的文藝活動。依照葉芸芸的研究，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化界出版過雜誌十五種、週刊及月刊二十八種，共計四十三種，可見他們重新展開活動的積極面。⁵⁰ 楊逵、蘇新、陳逸松、林忠、李純青、蔡慶榮、許乃昌、陳旺成、楊雲萍、龍瑛宗、張冬芳、吳濁流、王白淵、呂赫若、吳瀛濤等文化界人士，分別以《一陽週報》、《人民導報》、《民報》、《臺灣文化》、《中華日報》、《政經報》、《臺灣評論》、《自由報》、《和平日報》、《新新》為舞臺，或從事政論工作，或從事創作，或介紹進步文學，重新開啓了文化活動。其中呂赫若、楊雲萍等人已能用中文創作，並投稿於各報章雜誌；楊逵則以運動家的精神和步伐，創辦《一陽週報》，「介紹祖國的革命理想與文學作品」，後來還出任《和平日報》新文學欄主筆，並一再撰文，發表有關戰後臺灣文學重建、檢討之意見。自1946年3月15日起，龍瑛宗亦擔任《中華日報》日文欄主編一職。另外，吳濁流、葉石濤、吳瀛濤、王育德、黃昆彬、邱媽寅、陳金火、施金池、王碧蕉、莊世和、詹冰、蔡德本、賴傳鑑等數十名新、舊、漢、日文作家都在該日文欄發表作品，其原因固然是廣大的日文讀者和作家沒有其他閱讀或創作的出路，但也可看出戰後初期的臺灣文學建設運動，不僅參與者衆多，而且態度亦相當積極熱烈。⁵¹

除了臺灣文化界人士的活動再啓之外，戰後初期臺灣文化界的重大變化是，日據期間所阻斷的大陸文化與書籍開始得以進入臺灣。不僅如此，大陸文化界人士也陸續來到臺灣，他們與臺灣文化界人士之間的交流，日益

⁵⁰ 葉芸芸，〈試論戰後初期的臺灣知識分子及其文學活動〉，《先人之血·土地之花》，頁57-82。

⁵¹ 參見彭瑞金，〈《橋》副刊始末〉，《臺灣史料研究》9號，1997.5。

頻繁，並互相影響。在這樣的氣氛之下，展開新文學的可能性也大大地提高。臺灣與大陸文化人的交流，以雜誌的共同發刊，更形具體化。臺灣文化人與王思翔、張煥珪、許壽裳、黃榮燦等來臺大陸知識分子共同參與雜誌發行及報紙編輯工作，為新臺灣文化的建設，共同付出心力。譬如楊達和張禹主編的《文化交流》，王思翔、謝雪紅與楊克煌合作發刊的《新知識》，楊達擔任主筆的《和平日報》文學欄等，都介紹過大陸的進步文化和臺灣文化，也曾刊載兩地作家艾青、趙景琛、何其芳、茅盾、老舍、楊達、張深切、張文環、朱點人等人的作品。

1946年9月，臺灣和大陸的文化界人士共同成立『臺灣文化協進會』，並發行了機關雜誌《臺灣文化》，使得兩地之間的文化交流得到更具體的成果。該會的成立大會宣言為「建設民主的臺灣文化、建設科學的新臺灣、肅清日寇時代的文化餘毒、三民主義萬歲」，⁵² 可見兩岸的文化界人士，共同聲明要繼承新文化運動以來所接受的民主、科學等現代精神，同時強調去日本化，鼓吹中國民族精神，並且將這些共同認知作為往後建設臺灣文化的基本方向。『文化協進會』所發行的《臺灣文化》是楊雲萍擔任編輯的綜合性文化雜誌，它的內容除了文化、文學以外，還涉及教育、政治、社會等其他領域；整體來看，它所刊載的文章內容，基本上是指向於現代化新社會。該雜誌在介紹臺灣文化方面，除了刊載吳新榮的散文以外，也定期刊出〈本省文化消息〉，⁵³ 介紹臺灣民間童謠，整理有關臺灣社會與史料，⁵⁴ 評述臺灣的地方演劇，⁵⁵ 講述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等。⁵⁶ 在大陸文化方面，則介紹抗戰時期的文學，刊載魯迅特輯，記述中國的新文化運

⁵² 游彌堅，〈文協的使命〉，《臺灣文化》一卷一期(1946.9.15)。

⁵³ 共有七次，分別刊載於一卷三期(1946.12.1)；二卷一、二期(1947.1.1-2.5)；三卷四期(1947.7.1)。

⁵⁴ 例如第六卷第一期所刊載的〈臺灣考古學研究史〉、〈日人著作中臺灣漢文文獻糾謬述例〉、〈恒春縣志的發現〉、〈臺中縣大村鄉調查報告〉等。

⁵⁵ 主要為呂訴上所介紹的臺灣偶人戲、皮猴戲及〈臺灣演劇改革論〉。

⁵⁶ 楊雲萍，〈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一卷一期(1946.9.15)。

動，刊登〈國內名士印象記〉、〈文化動態〉等。⁵⁷

在《臺灣文化》所刊載的文章當中，與文學有關的有下列兩篇。一是杜容之寫的〈抗戰期中我國文學〉，⁵⁸ 內容主要介紹從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滿洲後所開始的抗戰期文學，以及針對抗戰已得到勝利的當今與即將到來的未來民主文學，表示一些個人的期許。他將抗戰期的文學命名為國防文學，認為國防文學是由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的合流所形成，並且指出國防文學一掃新文學運動期支離分歧的行幫流派現象，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號之下，建立了神聖抗敵救亡的聯合戰線。因此他主張在現今如此混亂的時局，國防文學所呈現的團結精神是需要學習的。另外，他特別肯定國防文學能吸取民間文學的養分，真正達到文學的大眾化，並期待將來中國文學，能學習它從廣大民衆攝取養分，能提煉中華民族文學的精華。他並且預言抗戰勝利以後的文學趨勢，必然集中在「民主的建設」，把民主定義為「是產自大公無私，客觀超然境界中的一種最高自由主義的道德，學問發展的果實」，反對一切的偏見與保守立場。

民主是一種通過自由思想，表現於多數人的客觀決定之意識形態，民主和自由乃是相因為果，無民主即無自由，無自由也無民主！所以要達到民主，必須先爭取自由，人民要享受自由，則必須做到貨真價實的民主！⁵⁹

如同自由與民主的互補關係，他主張今後中國的民主文學，必須在絕對自由的基礎上才能得到發展。

民主文學既是配合著今日世界文學的進步的世界觀，於是當承

⁵⁷ 參見《臺灣文化》總目錄，傳文覆刻本。

⁵⁸ 《臺灣文化》一卷一期(1946.9.15)，頁5-9。

⁵⁹ 同前注，頁9。

認既合理的高度的發展！所以文學工作者應把握了這個思潮的重心，憑著過去和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等一切反進步惡勢力的鬭爭經驗，共同爭取和發揚這進步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文學。

在民主文學的階段內，作家的寫作是應該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方面的限制和壓迫，不管作家的思想如何，立場如何，他要說的話就該放任他說，他要發表的文章，就該放任他發表，這樣絕對自由的情形下，我國文學才有蓬勃的生氣。

並且，我想雖然在這種極度自由的狀況下，作家們雖有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立場，但決不會衝突、昏亂，反之，他們會自動的組織起來，統一他們的工作，因為這時候，他們已發現一個建築在正義的客觀的焦點上的新理想，新目標，需要他們共同努力去追求，去實現，這就是和誰都有痛癢相關的共同期望；期望世界和平，中國強盛和人民康樂！⁶⁰

可見他透過封建性的排擊，以及對法西斯的強烈批判，強調自由、民主的現代價值，而且這些價值必須得到真正的實現，才能創造出新歷史的新文學。這篇文章雖然沒有提及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文學，以及解放後的臺灣文學所要呈現的具體內容如何，不過，他極力強調新時代中國民族的文學，一定要符合自由與民主的價值，同時也主張要接受世界性思潮。他如此重視自由和民主等現代價值與文學的關係，表示面對當時帝國主義勢力的全面倒退，他充滿信心能創造出新的中國文學。實際上，無論在臺灣或大陸，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均已接受了民主與自由的現代價值，只是其間臺灣由於淪為殖民地，大陸由於經歷國內情勢的混亂及外力的入侵，沒有得到充分的實行罷了，而現今面對光復和抗戰勝利的新歷史階段，他相信這些現代價值必會得到實現。

另一則是楊雲萍所寫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⁶¹ 主要以肯定的語

⁶⁰ 同前注。

⁶¹ 《臺灣文化》一卷一期(1946.9.15)，頁10-13。

調概觀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本篇雖然沒有具體的提到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核心精神所在，⁶²但在臺灣與大陸之間交流備受注目的時間點上，適時的整理及介紹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得以提供兩岸文學交流的基礎。楊雲萍透過這篇文章，主張整理及研究臺灣史的必要性，並認為臺灣的實情與經驗是建設新臺灣文化的前提。比起杜容之的文章，楊雲萍的見解更符合臺灣的實情，他跳脫了原則性主張，指出臺灣社會現實層面的許多問題，顯露出對臺灣文化與文學的建設上所抱持的希望。

另外，吳新榮在〈文化在農村〉⁶³文章中，則對戰後初期混亂的語言狀況及教育效果的不彰表示失望，因而主張以文學為核心的文化建設，而這個文學為主的文化建設，又是在民主社會的基礎上，方才可能，因此他非常重視臺灣社會上民主主義的具體實現問題。游彌堅也在〈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意義〉⁶⁴當中，強調中國固有文化的優點，主張儘快除去由日本嫁接過來的狹隘思想、自大觀念及歪曲的宣傳，但應保留日本所留下來的清潔、整齊、幽雅等文化氣息，並將它種植在中國文化的大地。他認為這樣才是臺灣的新文化，也是將來的中國文化。

具有半官方性質的《臺灣文化》，自光復後一年創刊，即持續出刊至1950年12月為止，主要貢獻在於兩地文化的交流。整體上來看，初期的內容比較著重在反封建與進步的革命精神，但歷經二二八事件以後，在官方的言論統制強化之際，其方向遂轉為純學術雜誌性質，集中刊載有關中國古典文學、民俗學及考古學的學術文章。不過，它所標榜的民主主義原則及民衆文學，不僅承繼了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現代性及大陸的進步文學傳統精神，更且成為戰後初期文學建設的主要方向。

⁶² 文章後面有附記說：「這篇小文，乃六年前，為李獻璋氏編『臺灣小說選』寫的序文的一部分。『小說選』組版甫成，即遭日當局禁止，故只有校樣以外，未得成書。現稍修改一二，用前記題目發表。可是，當時的種種的限制的痕跡，終是修改不了。」

⁶³ 《臺灣文化》一卷一期(1946.9.15)，頁21。

⁶⁴ 《臺灣文化》二卷四期(1947.7.1)，頁1。

二、臺灣文化的建設方向

從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開始，接受合理、理性的現代精神，並對文化的重要性，徹底覺悟的臺灣知識分子，面對光復後的社會混亂狀況日益加深，逐漸意識到臺灣文化的萎縮現象，因而開始尋找建設臺灣文化的新方向。光復後回歸祖國，意味著臺灣必須面對全中國的問題，也就是站在國共內戰的延長線上，面對國府的封建統治及民生問題。日益嚴重的民生問題，使文化發展沈滯不前，甚至對文化建設帶來負面效果。加上官方加諸臺灣人民，受到日本奴隸化或沒有文化等先入為主的偏見，因此，以持有合理的科學精神，鼓吹反封建、反帝國主義而自負的臺灣知識分子，更加體會到文化的危機感。

戰後初期出版的《新新》就表明對臺灣文化沈滯不前的憂慮感，並主辦有關臺灣文化前途的座談會。參加該座談會的成員多半是臺灣文化界人士，因此，透過在該座談會所發表的意見，即可知道戰後初期臺灣知識分子對新的臺灣文化的見解。該座談會的主旨在於認識臺灣文化的實態及當時的基礎，以掌握未來臺灣文化的走向。參加人士除了主席蘇新外，尚有王白淵、黃得時、張冬芳、李石樵、王井泉、劉春木等人。他們討論的重點包括：第一、在臺灣文化原有的實態方面，王白淵提出文化為保有人類的普遍性和民族的特殊性，並指出過去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化，就是漢民族文化與日本文化的抗爭史，具備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性質。第二、有關戰後初期臺灣文化的蕭條現象，蘇新和張冬芳共同提出民生問題等社會不安定，以及歷史性的相剋問題，就是造成此一現象主要原因的看法。其中歷史性的相剋問題，指的就是已熟悉日本語的作家，一時間無法熟練的運用國語寫作的問題。第三、有關文學所要表現的對象，張冬芳主張捕捉

現實，採用深入現實的方法，而蘇新提出由於當時的情況不容易表現出現實問題，因此，他預見臺灣文學的手法，將會朝象徵手法的方向發展。第四、有關臺灣文化應走的方向，黃得時提出全球化與中國化雙軌並進。他認為臺灣文學的世界化已在新文學運動時期達成，因此只要擴充、推進即可，而在中國化方面，他認為還有未盡之處，主張臺灣文化應往正面意義的中國化方向進行。對此，王白淵把民族性少而普遍性大的文化放在首要位置，認為民族性濃厚但普遍性稀薄的是低級文化，顯示出他較注重文學能呈現人類的普遍意識。黃得時也表示同感，提出與過分重視民族文化相比，更重要的是要能達到世界文化的水準，同樣是重視文學的內容更甚於表現媒介語言。王白淵重視文化上的國際主義，進一步主張在清算過去日據時期文化的同時，也須清算現今國民黨統治下的文化特色—排他主義，反對過分的強調中國語與中國特色。可見他所期望的新的臺灣文化，要能包含人類共通的普遍內容。因此，他提出臺灣文化應前進的方向為民主主義文化的方向。關於這個問題，蘇新也認為朝民主化的方向是正確的。

現在，我們的文化工作起碼也要朝民主化的方向努力，因為這樣便能夠提高民衆在民主主義方面的意識。

今後文化的前進道路，抽象地說就是朝民主主義路線前進，但所謂文化的民主主義路線，明白地說，就是必須要使文化成為民衆的東西，不管是國際性的或民族性的，如果大衆無法了解，就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想這一點是最重要的。⁶⁵

在這裡我們發現戰後初期的知識分子，在剛脫離帝國主義威權統治時，至為期待民主主義政治，同時也堅持文化的民衆路線，希望民衆能做文化的主人。因此，對於美術與文學方面，他們共同主張應該脫離沙龍美術或自慰式的私小說，堅持與民衆結合。此外，在較為實際的方案上，他們除了

⁶⁵ 〈談臺灣文化的前途〉，《新新》第七期(1946.10.17)。

主張必須強化民間文化機關，也批判當今的文化團體，幾乎變成政府外圍團體的實情。

由此可見，《新新》雜誌所討論的臺灣文化的建設方向，主要為新臺灣文化的內容，應該承襲新文化運動以來的世界性眼光，同時對尚不清楚的中國文化提高認知；不過，在此最為重要的是，這些方向的核心價值，要擺在民主主義的原則上面。可見臺灣文化界人士非常清楚臺灣文化蕭條的原因，因而定出新臺灣文化的基調，必須在以民衆為中心的民主主義原則上，同時擁抱世界性與民族性；也就是說，他們對新的歷史階段，抱持著肯定的觀點。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後，省籍衝突日益緊張，加上國府的全面進駐和白色恐怖的實施，這些期待與希望遂告全部幻滅。不過我們仍須知道，戰後初期臺灣文化界人士為了堅持民主主義原則(世界性觀點)，並確保民族性(民族性觀點)所付出的努力；若說前者的世界性觀點，是對人類普遍的現代價值的認識，那麼民族性觀點的後者，即是他們對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所需的民族性的重要性有所認識。如此，在民主主義原則之下，不會互相抵觸的世界性與民族性兩種價值，就是戰後初期臺灣知識分子所認知並要追求的現代性。

三、新臺灣文學論爭與現實主義人民文學論

如上述有關臺灣文化重建的討論內容，包括固守普遍的現代價值、除去日帝餘毒、提高民族性、同時堅持現實主義路線的原則，同樣適用於文學領域。而比較具體的文學理論，當在二二八事件發生造成民間言論媒體遭到廢刊之後，文學界人士遂以官方的《新生報》「橋」副刊作為舞臺，積極討論臺灣文學未來走向，最後還發展為臺灣新文學論戰的時候出現。在

政府日益強化對出版及外書移入的監視，並限制言論自由的情況之下，尙能以一年多時間，進行有關臺灣文學的論戰，乃是因為「懷著時代熱情與理念的人，不管省內或省外作家，共同攜手面對共同的命運，都寄望以推動臺灣的新文學運動促進時代的變革」。⁶⁶ 以「橋」副刊為中心舞臺進行的關於臺灣新文學的論戰，基本上繼承了前時期臺灣與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傳統，並在進入新歷史階段的轉換期，提出文學應擔任的角色及責任問題，在戰後初期確認臺灣文學的正體性，及保持對未來希望這一點上，具備肯定的意義。

論戰開始之前，在《臺灣文化》和《新新》中，對以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化及民衆當主人的民主文化，作為往後臺灣文化及文學基調的話題，不斷的被提出討論。光復後最早對臺灣文學提出歷史總括，並指出未來方向的范泉，主張重回祖國懷抱後的臺灣文學，要發揮中國文學固有的傳統，從而建立起新時代、新社會所需要的，屬於新中國文學的臺灣文學。⁶⁷ 賴明弘也呼應范泉的見解，主張新的臺灣文學要繼承日據時期遭到中斷的民族精神，同時提出今後臺灣文學的前進目標。

文化藝術的分野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文學必須加緊地指向寫實主義的大衆文學之路走了…我們的時代，正是要建設人民的自由與美滿而幸福的社會，藝術也擔任著一個重要的任務。今後我們的文學精神，必須傾注在這個意義上的工作，臺灣文學今後的目標，亦應循此路邁進。⁶⁸

可見他認為文學的主要任務，在於貢獻人民的自由及幸福的社會，引導出以民衆為中心的寫實主義文學，作為今後臺灣文學的核心課題。接著，在

⁶⁶ 參見趙遐秋、呂正惠，《臺灣新文學思潮史綱》，頁171。

⁶⁷ 參見同前注，頁162。

⁶⁸ 〈重見祖國之日—臺灣文學今後的前進目標〉，《新文學》第二期，轉引自趙遐秋、呂正惠，前揭書，頁163。

楊逵擔任主編的《和平日報—新文學》副刊中，也將寫實主義(現實主義)及以人民大眾為中心的民主主義原則，當作臺灣文學重建的主要內容。該副刊的第一期刊登了兩位大陸來臺作家樓憲和張禹(王思翔)合寫的文章〈一個開始·一個結束〉，這篇文章中提到：「文學者必須有一個深切的理解，公然地歸依於民主主義…我們必須為民主而生活，為民主而寫作，大膽地歌唱民主，予反民主以打擊；且必須站在民主的立場上，去理解對象，擷取主題」，而「在寫作的實踐中，必須到人民中去，寫出人民的意思，寫出人民能接受的作品」。整理他們的見解，可知他們所主張的，就是在人民文學路線上，以現實主義為創作方法的民衆文學論。他們認為現實主義是一種文學上的主觀自覺力量，是文學中最銳利的武器，亦即唯有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才能揭開反民主與詐欺的真面目。而楊逵也提出同樣的主張，在第二期〈文學再建的前提〉中指出：「只有展開真正的紮根於大地的現實生活的文學運動，才能開拓臺灣文學的重建之路」；在第三期〈臺灣文學停頓的檢討〉一文中也不斷強調「新文學就是人民的文學」，再次確認「現實主義的人民文學」為新臺灣文學的核心價值。⁶⁹ 這些主張可說與戰後初期的時代精神相互輝映，也就是說，當時的知識分子在脫離帝國主義統治之時，滿心期待著啓蒙時期的現代價值得以復活，另一方面又針對接收政權的封建性格及統治形態，極力提出民衆為主人的民主主義主張，說得上是文人知識分子正直的反映出變革期臺灣歷史所賦與他們的時代課題。而這個現實主義人民文學論的基調，在1947年以《新生報—橋》副刊為中心熱烈展開的臺灣新文學論戰，獲得了多數文學家的共識，逐漸形成臺灣新文學的主流理論。

就在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發展方向定在恢復民族性的同時，貼近人民大眾的現實主義文學，亦展開重建的工作，而且在二二八以後，固守在同

⁶⁹ 這一部分的敘述，參見趙遐秋、呂正惠，前揭書，頁163-165。

一原則的前提下，豐富多樣的意見持續湧現，因此臺灣文壇的焦點，遂集中於「如何建設臺灣新文學」上，發展成爲一場文學論戰。《新生報—橋》副刊於1947年8月1日創刊後，以三日或隔日出刊的形式，維持了二十個月之久，共出刊二百二十三期。以它作爲媒介的論戰，從1947年11月一直持續到1949年3月「四六事件」前夕。主編歌雷在創刊號裡發表〈刊前序語〉，聲稱「橋象徵新舊交替，橋象徵從陌生到友情，橋象徵一個新天地，橋象徵一個展開的新世紀」，主張「拋棄那些曾經終日呻吟的文字，那些文字就是使人鑽小圈子，傷感、孤獨、帶有濃厚傳染病菌的，因爲，唯美主義與傷感主義在今日讀者中已經沒有需要。」⁷⁰ 歌雷的這番話可以說爲臺灣新文學論戰埋下一個伏筆，因爲論戰的開端是批判以報紙副刊爲主的既有文壇充斥著黃色小說、舊詩詞等脫離現實的內容之故。

報紙副刊上的文章，充滿了名人以及名女人的軼事，陳舊不堪的掌故，「鴛鴦派」的抒情，以及庸俗酬唱的舊詩詞。有多少文人噤若寒蟬、不敢說話，也不敢發表文章，有多少文人大量寫著「大腿、櫻脣、隆胸、豐臀」的黃色文藝，和胡扯自道的洋幽默。⁷¹

面對如此的文壇狀況，左傾的大陸文人開始痛斥文學脫離現實，呼籲新臺灣文學運動的必要性；另外由於語言轉換問題，以及二二八事件的餘悸尚存，並在「動員戡亂」的政治威嚇下，而不免氣氛沈滯的臺灣作家，同樣也對背離臺灣文學傳統與當代現實的當時文壇，提出改革的呼訴。從批評文學無法反映現實而展開的新臺灣文學建設聲浪，經過對「臺灣」和「文學」的意見調整，發展成關於文學創作方法的論戰。在此，本文將簡單的針對論戰的過程進行整理評析，這個論戰過程從關於臺灣文學土壤的討論

⁷⁰ 《新生報—橋》副刊創刊號(1947.8.1)。

⁷¹ 轉引自彭瑞金，〈記一九四八年戰後的一場臺灣文學論戰〉，《文學界》10集(1984·夏季號)，頁2-3。

開始，進而針對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傳統的評價及檢討，以及對臺灣文學特殊性的再認定，最後則導出未來臺灣新文學的方向。

首先，有關臺灣文學土壤的討論，早在《新生報一橋》副刊爆發論戰的數個月之前，即已展開。大陸來臺作家夢周在《中華日報—新文藝》副刊上發表了〈展開臺灣的新文藝運動〉，主張展開一場「須求大眾化」、「向人民學習」的新文藝運動。⁷² 對此，江默流等部分外省文化人，在同一副刊上也提出意見，認為臺灣是文藝處女地，讀者理解國語的水準也低，因此在臺灣期待文學的發展有其困難。江默流進一步解釋說，臺灣文壇沈滯的主要原因，在於文藝工作者本身不團結，固定讀者在今日的本省亦尚未普遍；因此，即使目前雖然很難提出新文藝運動的口號，但至少文藝工作者應互相團結，掃蕩荒唐、神怪、鴛鴦蝴蝶、誨淫誨盜、低級、無聊、復古，以及一切有毒的元素。⁷³ 接著沈明、毓文(廖漢臣)、王錦江(王詩琅)等大陸進步文人及本省作家提到，臺灣重新投入祖國，正面臨歷史的一大變革，為迎接新時代的來臨，臺灣文學亦有其應盡的使命和任務。並且指出在日人的殘酷壓迫和摧殘之下，臺灣新文學尚能結出豐碩的果實，因此對其為維持民族文化所盡的努力，表示了肯定，同時也贊成夢周展開文藝運動的主張。這些意見，逐漸形成隨後發生之論戰的前奏曲。⁷⁴ 在《新生報一橋》副刊上刊載的第一篇相關文章為歐陽明的〈臺灣新文學的建設〉，⁷⁵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後，有關臺灣新文學的性格與方向、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評價、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問題、五四文學精神的當代適用問題、創作方法等諸多意見紛紛湧現，複雜得糾葛交錯一起，遂而發展為一

⁷² 參見趙遐秋、呂正惠，前揭書，頁171。

⁷³ 〈造成文藝空氣〉，《新生報—文藝》第七期(1946.6.18)。

⁷⁴ 沈明，〈我們要這樣的新文藝〉，《新生報—文藝》第九期(1946.7.2)；毓文，〈打破緘默談「文運」〉，《新生報—文藝》一二期(1947.7.23)；王錦江，〈臺灣新文學運動史料〉，《新生報—文藝》第九期(1947.7.2)。

⁷⁵ 《新生報一橋》二一九期(1949.3.8)。

場文學論戰。

針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性格與成果，歐陽明以為臺灣新文學運動形成了反日民族解放的一環，其目的在於「民主」和「科學」，與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目標相等，因而具備了光復後臺灣和祖國文學合流的基礎。加上，他詳細列舉了實際的作家和作品，以及臺灣新文學與大陸文學之間交流的事實，提出「建設臺灣新文學，也即是建設中國新文學的一部分」，因此主張臺灣的文化絕不可與祖國的文化分離。楊達也提出同樣的見解，他把日據時期新文學運動的性格，定調為「反帝與反封建」、「民主與科學」，強調《臺灣民報》、《人人》、《南音》、《先發部隊》、《第一線》、《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等文學雜誌固然無庸置疑，即令戰爭時期使用日文創作的文學，也未曾完全忘却新文學的傳統，極力陳述臺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站在同一陣線的事實。⁷⁶ 吳濁流也說日據時期臺灣文學一直就維持民族性，至於光復後的文壇沈滯現象，主要是因形式上的不同，也就是語言問題所造成。⁷⁷ 林曙光也提到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乃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以及歸因於武裝運動轉換成文化運動所致，即使在皇民化時期亦未喪失民族性，故而肯定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性格與成果。⁷⁸ 吳坤煌則舉出過去在日本的實際運動經驗，證明祖國與臺灣文人之間的合作關係，主張打破現在文壇的沈寂，才是最為重要。而現階段建設臺灣新文學的關鍵，不外乎語言的因素，對此，歌雷、陳大禹等人指出是文字與技巧的未成熟之故，相較之下，孫達人更重視內容，認為臺灣文學在內容方面已超越國內文學，並加以肯定。由此可見，參加論戰的人士，大部分都認為臺灣新文學的精神與五四精神並無二致，因此，光復後的臺灣文學，當然也與中國

⁷⁶ 歌雷，〈橋的路〉—第一次作者茶會總報告，轉引自《人間》(1999年·秋)，頁57。

⁷⁷ 同前注，頁58。

⁷⁸ 同前注，頁60。

文學的發展方向一致。⁷⁹

有關克服現在文壇蕭沉局面的方法，大部分人士提到內、外省人的團結，實際開拓文藝發表園地，以及語言問題的儘早解決等途徑。例如，楊逵就提出下列打開現今沈滯文壇的方法：(一)不問本省人或外省人，大家必須先打成一片，研討臺灣新文學再建的方策；(二)真正的文藝工作者結成一個屬於自己的、不為名士所操縱的團體，發行文藝雜誌及文藝報紙，介紹各種文藝活動的消息；(三)文藝工作者和文藝愛好者鼓吹並召開文藝座談會，形成文藝風氣；(四)計劃翻譯以日文寫成的文藝作品；(五)促進省內外作家及作品的活潑交流；(六)提倡寫實的報告文學等；都可謂是相當具體且可行性高的方法。⁸⁰ 此外，主導《新生報一橋》副刊的歌雷也積極參與了臺灣作家日文作品的中文翻譯工作，由此可見當時不論省籍，文學界人士共同付出心力，重建臺灣新文學的熱絡場面。

而在這個過程中，以語言與歷史經驗為論述中心，針對臺灣文學特殊性的論戰逐漸形成，並成為注目的焦點。歌雷認為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在於(一)臺灣作家所用的中文形式與技巧，仍停留在五四年代，這是因為臺灣歷經日本統治，作家的發表機會較少，加上現實環境的壓抑所造成的；(二)受到日本語文與臺灣的鄉土俗語、口語的影響，在語彙辭藻上，產生了極大的差異；(三)由於受到日本的壓迫，作品帶有濃厚的個人感傷主義與低沈氣氛；(四)在反抗日本統治的鬥爭中，作家的心理與反抗統治的心理合而為一，因此，作品大都保有民間的文藝形式與現實化風格。是以，他認為臺灣文學的特殊性，並不是為了強調地域性，而是藉著地域性的不同，更加的反映現實的真實面貌，以及運用民間的文藝形式而已。⁸¹ 另外，陳大禹則以為臺灣文學在語文傳達技術的表現方面，以及社會進化經驗上，具

⁷⁹ 同前注，頁60。

⁸⁰ 楊逵，〈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新生報一橋》(1948.3.29)。

⁸¹ 歌雷，〈橋的路〉—第一次作者茶會總報告，轉引自《人間》(1999年·秋)，頁62。

備了與國內不同的特殊性，主張往後的臺灣文學亦應解構此特殊性，擁抱一般性，不過，現階段的實際工作應該放在適應這些特殊性，以建立臺灣的新文學上。有關臺灣文學的特殊性，因參加論戰的每一個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其影響也一波波地蔓延開來。例如，彭明敏和雷石榆之間，就圍繞著與日據殖民歷史經驗有關的臺灣社會特殊性，展開一場脫離文學範圍的辯論；錢歌川則認為臺灣文學這個用語本身就有語病，因為臺灣文學是祖國文學的一部分，因此使用強調分離的「臺灣」二字明顯不合道理。⁸² 對此，有人主張臺灣的特殊性，不止於殖民經驗，而且還應包括自然、人文環境的差異所造成的特殊成分；又有人提出如果只是自然、人文環境的差異，那就更不需強調特殊性，因為大陸的各個地方也有此種問題等，於是發展成為臺灣特殊性與中國一般性之間的辯論。這些意見上的對立與論戰的展開，在社會及文學的範疇中，提供文學人再次思考臺灣處境的契機，具有肯定的意義。有關這些臺灣的社會與文學的特殊性，楊遠在〈臺灣文學問答〉⁸³ 中，簡單扼要的提出他的看法，周到又客觀，值得我們參考。

（一）對於「臺灣文學」的用語是否妥當問題

自鄭成功據臺灣及滿清以來，臺灣與國內的分離是多麼久，在日本控制下，臺灣的自然、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在生活上的環境改變了多少？這些生活環境使臺灣人民的思想感情改變了多少？如果思想感情不僅只以書本上的鉛字或是官樣文章做依據，而要切切實實的到民間去認識，那麼，這統一與相通的觀念，就非多多修正不可了。…所謂內外省的隔閡，所謂奴化教育，或是關於文化高低的爭辯都是生根在這裡的。這是很可悲歎的事情，但卻是無可否認的現實。「臺灣是中國的一省，臺灣不能切離中國」！這觀念是對的，稍有見識的人都這樣想，為填這條隔閡的溝努力著。…

⁸² 同前注，頁63。

⁸³ 《新生報—橋》1948.6.25。

為填這條溝最好的機會就是光復後的臺灣人民的熱情，但這很好的機會失了，現在卻被不肖的貪官污吏與奸商搞得愈深了。對臺灣的文學運動以至廣泛的文化運動想貢獻一點的人，他必須深刻的瞭解臺灣的歷史，臺灣人的生活、習慣、感情，而與臺灣民衆站在一起，這就是需要「臺灣文學」這個名字的理由。

(二) 對於臺灣新文學與中國文學、日本文學的對立問題

臺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存在的只是一條未填完的溝。…文學問題不僅是作者問題，也是讀者的問題，讀者不能瞭解同情，甚至愛護的文學，是不能存在的。人民所瞭解同情，愛護的文學，如果它受著獨裁者摧殘壓迫，也不能消滅，反之，奴才的文學，它雖有主者的支持鼓勵，而得天獨厚，也不得生存。總有一日人民會把它毀滅而不顧。正如這樣，臺灣文學是與日本帝國主義文學對立，但與它們的人民文學沒有對立的。

(三) 對於奴化教育問題

部分的臺灣人是奴化了，他們因為自私自利，願做奴才來昇官發財，或者求一頓飽。但這種人，在今日原原是一批奴才，他們的奴才根性，說因教育，寧可說是因為環境。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控制下的這個孤島上，自私自利的人都得做奴隸才得發其財。託管派、拜美派當然也是這一類的人。但大多數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臺灣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鬭爭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證。奴化教育是有的，但不僅在日本帝國主義下。所有的帝國主義，所有的封建社會、封建國家都大規模的從事著奴化教育。

(四) 對於當前任務問題

切實的文化交流是今天在臺灣本省外省文化工作者當前的人們，為達到這任務的完成大家需要通力合作，到民間去，去瞭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心情，而給他們一點幫忙，這正是做哥哥的人可以得到弟弟瞭解、敬愛的工作，進而可以成為通力合作的基礎。⁸⁴

⁸⁴ 這個部分係依前注的文章內容，加以整理而成。

可見楊逵維持著一貫的立場，即重視文學的民衆性；他提出文化工作者的當前任務為先瞭解民衆的感受，然後創造出民衆所能接受並愛護的文學，如此才是建立臺灣新文學的基礎。

另外，楊逵透過數次的意見發表，將臺灣文學的方向，訂定為人民文學，這是他從新文學運動以來即所堅持的文學信念，也是站在對當時臺灣現實的批判角度，所下的合理判斷。因為，不僅是楊逵一個人，就連其他參加論戰的大多數文人，也都主張人民文學或大眾文學。在這裡可以察覺出主導「橋」副刊論戰的文人，大多具有左翼傾向；例如同意楊逵立場的臺灣作家，即著眼於政治、民生等社會全盤性的惡劣處境，強調文學的時代使命在於批判現實及民衆苦痛的呈現上；而大陸來臺的左翼傾向作家，亦在左聯、大眾文學論的延長線上，提出以人民大眾為內容的文學。

新文藝的內涵，既是新的，進步的，反映出這時代和社會的真實面目來—苦痛和歡樂，黑暗和光明。那一個充實的文藝工作者，必然的是應生活在大眾的中間。他是屬於大眾的，他的聲音應該是大眾的聲音。所謂生活在大眾中間，並不是被動的只看到大眾歡樂和痛苦的表面，黑暗或光明的輪廓就算了事，而是要主動的由下而上的深刻的了解他們，同大眾一樣的呼吸，一個充實於文藝工作者的心，應該同大眾的心融合成一個心。能這樣，才能產生瑰麗燦爛不朽的文藝作品來。這是展開臺灣新文藝運動的一個大前提，一個總路向。⁸⁵

我提出「文章下鄉」的舊口號來，我們應該從書房裏走出來；從沙發上站起來，從都市裏走到鄉間去，走到廣大的農村去，同那些以前被我們忽略了的苦老百姓們生活在一起，感覺他們所感覺的，並大聲的喊出來，大膽的寫出來，能如是，我們的文學運動，才會得

⁸⁵ 楊風，〈新時代，新課題—臺灣新文藝運動應走的路向〉，《新生報—橋》(1948.3.26)。

著更多人的共鳴和支持，才有它堅強而擴大的基礎，才不致使文學運動的種子就在那枯竭了的都市裏發芽、含苞，而開出了一朵病態的慘白的花來。⁸⁶

爲使文學與人民大眾連繫一起，喚起群眾興趣，鼓勵群眾參加文藝工作及創抒，提倡寫實的報告文學。⁸⁷

藝術是大眾的，文學是大眾的，在這個時代，社會，現實裡頭，我們要說出大眾的聲音，我們有理由要求藝術的控訴力——對無理的控訴，對強暴的控訴；對黑暗的控訴；向人類的心靈控訴。⁸⁸

爲今後「新臺灣文學運動」的具體意見，應該是使它走向大眾文學的道路，使文學能切實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我們要求把全部人民的生活寫出來，寫得通俗，寫得真實，使文學全部爲人民服務，努力地排除資本主義社會文學的錯誤的觀念。…它需要能擔負起暴露黑暗，啓導人性和啓導社會的使命，配合著祖國文學運動的發展，急速地迎向世界文學進步的潮流。⁸⁹

如引文所見，參加論戰的許多人士，都主張文學要真實地描寫民衆的生活與現實，於是形成了人民文學論。這可說他們不僅正確地把握了文學的時代使命，一同繼承了臺灣與大陸新文學運動中的民衆性，同時也具備時代性與進步意義。而人民文學論透過不同意見的提出和反駁中，也得以更形鞏固，並發展爲與文學創作方法相關的討論。此論戰的發端爲阿瑞的文章〈臺灣文學需要一個「狂飈運動」〉。⁹⁰ 他認爲臺灣人民經歷殖民統治，受到感情表達的限制，因此必須接受重視個人自由、民主政治的狂飈運動的

⁸⁶ 楊風，〈「文章下鄉」談展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新生報—橋》(1948.5.24)。

⁸⁷ 楊達，〈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新生報—橋》(1948.3.29)。

⁸⁸ 史村子，〈論文學的時代使命—藝術的控訴力〉，《新生報—橋》(1948.4.2)。

⁸⁹ 姚筠，〈我的新臺灣文學運動看法〉，《新生報—橋》(1948.6.9)。

⁹⁰ 《新生報—橋》(1948.5.14)。

真精神。他並指出作家具備天生的敏感性，只要給他們足夠的自由，他們自然會受到時代的制約，創造出合乎時代的作品，為此，他進而強調開放個性、尊重感情的重要性，反對以單一主義主張來抑制作家的個性。針對這個論點，楊風和雷石榆也各提出了不同意見，並引起有關文學創作方法的爭論。楊風認為中國文學早在五四時期，就進行了反帝反封建反舊禮教的運動，已經獲得了個性解放的成績，「現在整個中國的進步的文藝運動，已不再是邁著老步子要求個性奔放的「狂飈」時代了，中國的文藝運動，已邁著它新而健強的步伐——那就是我們叫慣了的現實主義的大眾文學。因為展開時代的進步，在催促著要求著，文藝工作者，到大眾中去，和大眾生活得在一起，因他們一起生活，一起呼吸，一道歡樂，也一同痛苦，並這樣寫出來、喊出來。」⁹¹ 針對楊風反對個性開放，提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意見，雷石榆首先贊成狂飈運動的正面意義，進而提出新寫實主義創作方法。

爲了「開放個性，尊重感情」及「打破所謂『臺灣文學』的狹隘觀念」而提倡「狂飈運動」還是不夠的，不管我們所提倡的「狂飈運動」與過去歐洲所發生的有其不相同之點（中國的五四運動也叫狂飈運動，也與過去歐洲所發生的同義不同質），但偏向於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實必然的。我們固然是需要開放個性，尊重感情，解說思想，打破狹隘的觀念，藉以剷除存在於臺灣社會下層的傳統的封建意識及殘留於市民層中的被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歪曲了的觀念；同時更需要涵養更高的人生觀（提高浪漫主義的個人中心到群體中心），宇宙觀（提高浪漫主義的精神超越到科學的認識），更深刻之觀察現實，分析現實的特異、零圍、動向，沒入生活，使用生活的鍊金術；從民族一定的現實環境，生活狀態，把握各階層的典型的性格，不是自然主義的機械的刻畫，不是浪漫主義架空的誇張，而是新的寫實主義爲依據，強調客觀的內在交錯性、真實性；強

⁹¹ 參見楊風，〈「文章下鄉」談展開臺灣的新文學運動〉，《新生報—橋》（1948.5.24）。

調精神的能動性、自發性、創造性；啓示發展的辯證性、必然性。新的寫實主義是自然主義的客觀認識面與浪漫主義的個性，感情的積極面之綜合和提高。它是由最小到最大，由縱到橫，由最低到最高，由民族到世界，在創作方面上的前提。它攝取地繼承遺產，它又獨創地開擴創造。它是最科學的，同時也是最藝術的。它是最多樣的，同時也是最凸出的。⁹²

典型的環境和典型的人物描寫、浪漫主義精神的強調等，他繼承了三〇年代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理論—革命的浪漫主義。⁹³ 並且在此原則上，他提到應該接受資本主義帶來的科學性、技術的組織力、事物的廣泛知識等肯定面，以及攝取世界文學和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遺產。可見他已脫離左翼文學教條的、宗派的黨派性，而維持開放的觀點。

接著，楊風批判雷石榆所主張的新寫實主義有誤導新寫實主義之嫌，他解釋說：「新寫實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主張階級文學的(即文學階級性)，根本就拒絕雷先生裝在之袈裟裡的『浪漫主義』的『個性』和『情感』的。新寫實主義的『情感』，也只是款待勞動人民追求民生、反專制、求解放、反獨裁的積極的行動和怒潮。新寫實主義的『個性』是廣大勞動人民的『群眾性』」。⁹⁴ 之後兩人之間持續展開數次針鋒相對的論戰，⁹⁵ 不過，分析他們的看法，不難發現他們的爭論，乃起於對新寫實主義的認知差異，並沒有根本上的不同，都是在現實主義範疇內加以討論的。他們同樣認為新寫實主義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只是楊風比較堅持左翼文壇的現實主義原則，而雷石榆則贊成左翼文壇為了突破創作上的困境所接受的浪漫主義手法，因此他指楊風為形式主義階級文學家。由二人所引起的社會主義現

⁹² 雷石榆，〈臺灣新文學創作方法問題〉，《新生報—橋》(1948.5.31)。

⁹³ 參考本論文第三章第二節。

⁹⁴ 楊風，〈五四文藝寫作—不必「五、四」看齊〉，《新生報—橋》(1948.6.7)。

⁹⁵ 例如，雷石榆，〈形式主義的文學觀—評揚風的「五四文藝寫作」〉(1948.6.14、16)；揚風，〈新寫實主義的真義〉(1948.6.28)；雷石榆，〈再論寫實主義〉(1948.6.30、7.2)；揚風，〈從接受文學遺產說起〉(1948.7.7)等文章。

實主義論戰，在駱駝英、歌雷對雷石榆表示肯定及重申之後，才告一段落。他們共同主張解除浪漫主義和寫實主義，以及個人和集體的相互矛盾和對立，達成兩者之間的統一，堅持新寫實主義路線。但可惜的是，由於創作的不足，無法針對實際作品進行分析，也未能進展到討論具體的創作方法上，只留下人民或大眾的口號。其中，楊達較為具體地提出臺灣文學的描寫對象，他舉出以貪官污吏為代表的當時政治現實，以及疲弊的民生，主張臺灣文學要表現地方性和現實性。⁹⁶

另外，在討論創作方法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的性格及五四精神的時代適合性等議題浮上檯面，主要論者孫達人係針對主張拋棄五四口號的胡紹鍾，提出當今中國社會性格仍屬半封建半殖民狀態，因此五四精神仍然有效的看法。對此，揚風認為五四文學的任務，除了反帝反封建之外，也包括反對國粹及舊文學，以及提倡白話文等，由於部分任務已達成，並且在經歷左聯與大眾文學之後，中國文學已在變遷當中，因此回到五四是不妥當的。⁹⁷ 接著孫達人進一步提出，當今還需要提出五四精神，那是因為中國社會仍然未進行改革的關係，不能以抽象的歷史革命論來隱藏歷史的真實。

如此，不僅是臺灣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另外還糾結了許多其他問題的新臺灣文學論戰，直到刊載了駱駝英的綜合整理，⁹⁸ 才告一段落，之後的數篇文章並沒有超出前述的討論範圍。駱駝英首先將論戰的內容分為(一)臺灣過去的文學是怎樣的？(二)臺灣有無特殊性？「臺灣文學」此一口號對嗎？(三)自五四到現在中國的社會變了沒有？(四)新現(寫)實主義中容許浪漫主義否？(五)新現實主義的文藝中有無「個性」？(六)是否可以偏向浪漫主義？(七)臺灣應該建立怎樣的文學？(八)如何建立臺灣的文藝？等問

⁹⁶ 楊達，〈臺灣文學問答〉，《新生報—橋》(1948.6.25)。

⁹⁷ 揚風，〈五四文藝寫作—不必「五四」看齊〉，《新生報—橋》(1948.6.7)。

⁹⁸ 駱駝英，〈論「臺灣文學」諸論爭〉，《新生報—橋》(1948.7.30-8.22)。

題。他針對這些問題，綜合各家的看法及自己的想法，提出如下的意見：

(一)過去臺灣與中國新文藝的主流，同樣都是反帝反封建。

(二)臺灣固然具有別於中國的特殊性，但重要的是，「分析臺灣階段的社會特殊性，而從這個別的因素裡找出一般性來，來配合現今全國性的新文學的總方向」。至於使用「臺灣文學」四個字，並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凡是成功的文學作品必定是地方的，同時又是民族的，世界的。

(三)五四以後的中國社會不斷變遷，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性質還沒有改變，因此五四精神仍然有效。

(四)-(六)新現實主義是立腳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上，且站在歷史發展的方面相一致的階級的立場上的藝術思想和表現方法。它是在最新的觀點(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上，批判地接受了革命的浪漫主義和舊現實主義的優良成分的產物。即革命的浪漫主義(和舊現實主義)作為新現實主義的有機的成分不可缺少的成分而統一於其中。因此，新現實主義所吸取的正是浪漫主義中積極的浪漫主義的思潮，即吸取其「強化人對生活的意志，對現實和現實的一切壓迫反抗心從人的內部喚醒起來」(高爾基話)。

而新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方法，正是要由社會的個別事件與一般性的矛盾的統一及在此基礎上生長的人的個別性與一般性的矛盾的統一中攝取題材，鑄造典型(即從典型情勢中鑄造典型性格)，而構成其思想內容。在這裡的「典型」所指的是，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所由產生的典型情勢。即社會的性質和動向通過它而決定人物的典型性格，但又是由人物所串演出的個別事件與人物活動的環境及社會的特質和動向的統一。所謂個人的東西與社會的東西的統一。其中個人的東西就是指個人的特徵。社會的東西，在階級社會裡，一方面就是指階級性與階層性，另一方面就是指「群體性」(如民族性、人民性、集團性)。因此，人物的典型是個人的特徵(包括個性)與階級的特徵(包括階級性)、群體的特徵(包括群眾性)的統一。這個統一不是個性上加上一點「階級性」，再加上一點「群體性」，而是各階級的群體的特徵不可分割地統一於個人的特徵中(活生生的個性中)具體地表現出來。真正成功的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其整個

的個性或任何一點細小的個性，從某一方面看它是個性，擴大看它又是階級性，同時也是群體性。

(七)-(八)呼籲文學工作者應具有民主、解放、進步的共同認識，建構聯合戰線，並以謙虛的態度前進到人民大眾裡。⁹⁹

駱駝英不僅整理出參加論戰人士的各種意見，同時在新現實主義概念的釐清與創作方法上，重新強化了現實主義文學。透過該論戰，包含臺灣新文學的性格與成果、臺灣文學的民族性與特殊性的確認，以及人民文學論、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確立等諸多內容，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那就是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論乃是現實主義民衆文學論。而這個文學理論，不僅與以民主為最高價值的當代時代精神相吻合，並且將文學的時代任務確立在批判現實，文學的對象確立在人民大眾，且繼承了日據時期以來臺灣文學的民衆性。換言之，戰後初期的時代狀況對文學的要求，不僅在於個性的發現與開放，或者文學的自律性，更是在於對現實的批判、改善及進步的要求。雖然在臺灣新文學論戰中所提出的看法，由於內戰的擴大及國民黨的全面撤退，而消失在歷史的舞臺上，但是此論戰所提出的文學民衆性的議題，是文學的根本任務，亦是當代文人對現實進行思索的產物。只要文學與社會並存一天，這便是永遠需要探究的功課。

第三節 戰後初期小說所反映的現代性

一、光復的喜悅與歷史的方向

⁹⁹ 這個部分係依前注的文章內容，加以整理而成。

結束了長久的殖民地生活，臺灣人民終於盼到的光復，不僅帶來恢復主權的喜悅，也帶來了能創造自主性歷史的希望。戰後初期的短篇小說，首先反映的就是這種喜悅與希望。龍瑛宗的《青天白日旗》¹⁰⁰ 寫的是還不知道已經解放的農民父子，看到鎮上與往常截然不同的氣氛，而開始感受到解放的喜悅的內心歷程。作者以「向來沒有精神的街頭巷尾，眨眼間朝氣勃勃地振作起來了。人潮也出奇的多，而臉龐總是笑嘻嘻」，並且以對這些光景是「從來沒有看過的表情」，來反映光復的實感與長久的殖民地陰影。對一個在山裡只知道勞動的農民來說，光復是突然的，雖然農夫阿炳「心內一直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始未料想到這麼快了」，因此一時無法真正回過神來，好像「還是一場夢」，並感到「有點茫然自失」。而且，這種感覺很快便轉換成新生活的希望。在殖民期間，由於穀糧的強制徵收，臺灣人民不管如何努力，仍然不免生活的困苦，並且受到堪稱土霸王的日本警察的欺負，一直感到無祖國的悲哀，而現在，只要以堂堂的祖國百姓的身份，就可以活下去。樸實的農民所認知的的光復，就是讓他們能「安心地幹田園的工作」的時代到來。這篇小說將殖民地百姓所受到的各種拘束與限制，與往後即將到來的能平等安樂地過日子的希望，以對比的方式來加以描述，借此傳達迎接光復的激動。在這裡「青天白日旗」就是象徵著擁有自由、平等的未來。

雖然對有些臺灣百姓而言，光復的到來好像是夢一般的不真實，但是在被殖民期間，其實他們並沒有中斷過解放的努力。龍瑛宗的另一篇《從汕頭來的男子》，¹⁰¹ 描寫臺灣青年周福山因對日本的民族差別政策懷有不滿，而到大陸去當軍人，希望從事抗日工作；但由於戰勢不利，只好回到臺灣，邊讀書邊蓄積能量，以備光復的到來；不幸的是，他卻等不到解放

¹⁰⁰ 原載於《新風》創刊號(1945.11)。

¹⁰¹ 原載於《新風》創刊號(1945.11)。

就離開人世。這篇小說透過周福山的行跡，表達出臺灣人民在帝國主義壓制當中，仍然懷有光復的希望，並實際參加抗日活動。他的反抗出走、武裝行動、撤退臺灣，最後死亡的過程，顯示出臺灣知識分子面對日帝的壓制，以及日本發動的大規模戰爭，仍然堅持著反日意識，並深信光復的即將到來。小說安排將周福山的一生，透過敘述者的回想方式呈現，而這篇作品的敘述者，則由於受到日帝動員世界上知名的警察網路，而處在被監視、拘留、拷問等限制，以致無法表達自己想法，只能維持消極對抗的狀態。周福山則不畏日本的這些蠻行，他正面表露出自己的看法，並付諸實際的行動，維持著對日本積極對抗的姿態。作者安排消極的敘述者與行動派知識分子，在反日思考及行動上，進行對比敘述的同時，藉此表達這兩種人物類型，對臺灣與祖國的未來，共同感到憂慮並期待光復的心聲；企圖展示出全體臺灣人民雖然歷經嚴苛的殖民統治，但仍沒有拋棄對未來保持樂觀展望的事實。

另外，這篇小說不僅吐露對日本壓制的批判，同時也提到民族感情與資本主義問題。周福山嚮往自由天地，並懷青雲之志，毅然渡海前往汕頭，投靠大陸的叔父，但在那裡他卻目睹了日本政府與臺灣商人合作，壓迫祖國商人的情形，因而受到無比的衝擊。

周福山於汕頭叔父的店舖裡做事，但是擺在眼前的現實與他的理想，竟有一大段距離，而使他痛恨透了。於遙遠汕頭城裡的臺灣商人，仍是戴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帽子。壓迫著祖國的商人。原來日本庇護臺灣同胞。

由於祖國沒有關稅自由權，祖國的商人不得不打貨成本高昂的貨品。他們怎麼經得起與外商做生意呢？被打垮才是他們的運命。

102

¹⁰² 《臺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頁179。

周福山看見帝國主義的爪牙，欺凌著祖國的生意人，認為同樣身為臺灣人的自己只是一隻借虎威的狐狸，因而感到變成幫凶的悲哀。小說透過這樣的安排，沈痛的揭露出以帝國主義為代表的日本資本主義，已經擁有可以滲透民族感情的力量。在民衆所接觸的日常生活中，即使是中日民族之間尖銳對立著，但是它並不能解決所有事情，資本主義的邏輯反而發揮了更強大的力量。

以上，我們透過龍瑛宗的兩篇作品，可以感受到臺灣人民對解放的喜悅，以及對未來保有的希望，甚至他們為了臺灣的光復及祖國的未來所付出的努力。不過，我們也可發現，在戰後初期的小說當中，書寫這類內容的小說並不多，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第一、戰後初期為政治上的昂揚期，大部分知識分子直接或間接參與社會的重建工作，而無暇從事文學活動；第二、在語言使用方面，臺灣作家需要一定時間的適應期；第三、不久即看到接收政權的封建性格，以及受到中國內戰的影響，百姓的生活逐漸進入全面倒退狀態，因而小說中對解放的喜悅與新歷史發展的期待，出現日益減少的現象。

二、批判日本殖民統治及其留下來的問題

光復帶來的第一個效應就是言論的自由，作家們開始採用之前被禁止的話題，尤其是在皇民化時期日本所恣行的創氏改名、強制使用日本話等民族抹殺政策，以及戰爭期所發生的一些狀況，都成為小說的題材。呂赫若是最早以批判的觀點，將這些被禁止的話題納入小說。他在《故鄉的戰事——改姓名》¹⁰³中揭露皇民化運動一環的改姓名，對小孩心靈所造成的

¹⁰³ 原載於《政經報》二卷三期(1946.2)。

傷害，以及其象徵的虛偽意識。「我」在火車上目睹一群小學生責罵一個改姓名的同學，而那個小孩，即使被同學斥罵，還是不願意當臺灣人。

不消說這些小學生是拿「改姓名」的這個名詞來做「假偽的代名詞」，是認為改姓名是假偽的。世說，小孩子是純真的，這句話很對了。日本人聲聲句句總說臺灣人改姓名是一視同仁的，是要做過真正的日本人。但敢不是在此曝露了他的肚子嗎？¹⁰⁴

小說結尾的這一段話，反映出作者的想法。作者以連小孩都認為是虛偽意識的表現來認知改姓名這件事情，提出日本在臺灣實施的皇民化政策是失敗的。

另外，在《故鄉的戰事二—一個獎》¹⁰⁵中，呂赫若揭露戰爭期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外宣傳的勇敢形象都是虛偽的。農民唐炎在田裡發現未爆彈之後，陷入雙重的苦悶。他除了害怕處理它時可能遭致引爆之外，也害怕若是因此置之不理，官廳將加罪於他。小說的背景為太平洋戰爭期間，百姓如果被發現與武器有任何的關聯，就可能被按上幫助敵犯的罪名，而受到嚴厲處罰。最後唐炎害怕被冤枉，拿到派出所去，目擊了平常威嚴十足的日本警察池田，看到他拿的未爆彈，嚇得魂不附體，連忙躲進防空壕。後來唐炎被池田指控為一個投彈敵暗殺犯，而遭受空前的鞭打。小說透過唐炎告訴村莊裡的人說：「不要緊，我知道了，日本人絕不是不怕死的。從前人家老說過日本人是不怕死的，這完全是瞎說，我知道了」，來諷刺日本人將對外侵略戰爭美化成聖戰，聲稱自己不怕死的行爲。

此外，呂赫若在《月光光—光復以前》中，¹⁰⁶透過一家人的故事，來刻畫皇民化時期所實施的日本語政策，帶給臺灣人民精神折磨的痛苦。由

¹⁰⁴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頁518。

¹⁰⁵ 原載於《政經報》二卷四期(1946.3.25)。

¹⁰⁶ 原載於《新新》第七期(1946.10.17)。

於戰爭，大部分的房子遭到破壞，有八口人的家長莊玉秋找不到家人可以安身的住處。然而好不容易找到的房子，房東卻提出專用日本語、過日本式生活才能出租的條件。莊玉秋只好謊稱「我是個很贊成皇民化的人，我的家庭，是國語家庭，有風呂、有疊、有神棚、有日本衫一式，吃還是日本式的」，因而得到許可搬了進去。但是從搬家的那天起，他們深怕謊話被揭穿，幼小的孩子和老祖母都不敢外出，只能在房間裡生活，於是變得更加憂鬱。

再過幾天，孩子們便漸漸兒的曉得自己的命運壞的。只是整日坐在平平凡凡的房裡，俯首只看著自己的手脚，連動也不動了。時時若想著外頭那空闊的地方，隔壁兒的孩子們那麼跳躍似的玩耍，蜻蜓蚱蜢等隨意地飛著跳著，就立刻傷心起來，彼此抱著就哭了。可是也不敢放大了喉嚨啼作聲，僅僅眼角上湧了奔流似的眼淚出來，頗有使人傷心的。看見可憐孫兒們的這樣淒慘，老祖母也含了許多眼淚抱著他們，不知不覺地就想起自己也和孫兒一樣的被關住著的人。她因不會說日本話，只是在家裡，外頭的工作一向是莊玉秋的妻去做的。所以絲毫都沒有談話的對手，這老人家就掙扎不住了。她便一天比一天的惡罵起來。¹⁰⁷

可見皇民化運動造成臺灣人民的精神荒蕪有多深。最後老祖母忍不住吶喊：「房東家呀，你不是日本人，你是明明白白的臺灣人。爲什麼不准人家說臺灣話呢？你是個吃日本屎吃得很多的人呀！」眼看著母親和孩子的憂鬱加深，莊玉秋終於跟孩子一起大聲唱出臺灣童謠「月光光」，釋放出之前的鬱悶。從他說的「你們不成臺灣人呀！臺灣人裝作日本人，就把它來欺凌著臺灣人，你真真的是人嗎？」以及「現在他也看孩子們的這麼高興得雀躍，假使從明天起再跑來跑去的找房子，他可也甘願去了」中，作

¹⁰⁷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529-530。

者企圖揭露戰爭期日本所實施的民族抹殺政策，其實是奪取臺灣人民最基本的人的條件及權利，造成嚴重的人性扭曲。

吳濁流的《先生媽》和《陳大人》，¹⁰⁸ 共同以諷刺的口吻，揭露日據時期臺灣人當中假借日本支配者的勢力，來欺負同族的虛偽與奴隸性。《先生媽》中的錢新發，原本是貧苦人出身，但他娶了個有錢的太太，當了醫生之後，用盡各種方法來發財。他對患者全是假親切、假好意，但對高官與有權人，卻是恭敬得不得了，可見他重視的是金錢和權威。他有一種愛錢癖，但又不惜千金捐款，而這種捐款都是為了業務，不脫自利的打算。不僅如此，他還完全接受日本性，整天「研究日本生活，實現日本精神」，國語家庭、改姓名、日本式生活，當然是以他為首。結果是已成為地方士紳的他，卻有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那就是他的母親。他的母親「先生媽」不但愛施米給乞丐，而且完全不配合他講日本話、過日本式生活的苦心，堅持穿臺灣衫，過臺灣式生活。小說結尾安排先生媽去世時，將兒子錢新發的「不感悲傷」與受先生媽恩惠的乞丐「真心悲痛」，互相對照，指出認同日本性及金錢至上的真正意義。作者透過錢新發的故事，對於當時一部分人迎合日本政策，自發性的拋棄自己，變成日本人的事實，提出反省與批判。而《陳大人》中的陳英慶是個典型的日本人走狗，比日本人還會欺負自己的同胞。當了小小巡察的他，目中無人，處理事情時，只看職位的高低，不看年紀，也不看事情的來龍去脈，因此不用說一般老百姓被他欺負，連受到村民尊重的劉舉人、反抗日軍的錢鐵漢也遭受屈辱及逮捕。

警察的力量是絕對的，若是清朝，即使拼命讀書，莫說舉人，連秀才也考不上，那有今日這般地位呢？那能得舉人爺來託我說情？想我陳英慶不知不覺做到了不起的大人物了。¹⁰⁹

¹⁰⁸ 原載於1945年出版的《新生報》與《新新》。

¹⁰⁹ 《臺灣作家全集—吳濁流集》，頁45。

從上引他的一段話中，即可知道當時警察的想法和作為如何。這些人物的出現，是日本實施警察政治之後的必然產物，他們完全模倣日本警察的想法與行為。因此作者設定這類人物當作小說主角，包含著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以及自我反省。小說中，陳大人仍不滿足於權威，他更變本加厲，追求不合法的金錢及女人，而終至沒落。因他而走入歧途的女子阿菊也面臨墮落一途，作者如實地揭露出這些冒牌日本人，充滿顛倒價值觀的結局。

戰後初期的臺灣作家，除了上述對日本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傷害，提出批判之外，對殖民所留下的問題，也進行了若干的探討。黃昆彬的《美子與豬》，¹¹⁰ 探討日本女性與臺灣男人相愛，以及光復後日本女性在臺生活的故事。美子的先生世哲是一個不善表達對妻子愛意的人，他平常對妻子不多表示關心。美子在傳統的臺灣家庭，受盡婆婆的各種虐待及過度的勞動。不僅如此，在光復後第一次日僑遣返日本的時候，婆婆為了讓世哲再娶縣議員的女兒，要美子回日本去。美子以服毒的方式，抵抗婆婆的命令；而在挽回性命之後，離開了傳統家庭，靠著先生的微薄薪水過日子。與婆婆分家的美子，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養豬。她之所以養豬，是為了幫教員先生買新製筆挺的西裝。小說雖然淡淡的描寫美子養豬的點點滴滴，並因霍亂失去豬仔後非常傷心等日常細節，不過，卻把美子刻畫成非常努力適應臺灣生活的賢妻型人物，這與過去的日本人形象大為不同，讓讀者在時代、國家與個人的議題上，留下一些省思的空間。

邱媽寅的《叛徒》¹¹¹ 寫的是戰爭末期原本參加反日運動的臺灣學生靖彬，以「四海一家人」自處，背叛了同胞的期待，最後加入日本軍隊參加戰爭而死亡的故事。靖彬脫離東京留學生的反帝運動，主要原因就如他自己說的，「我老早就知道，臺灣人根本都是應該輕蔑的，一點都不可靠，不

¹¹⁰ 原載於《新生報—橋》159期(1948.8.30)。

¹¹¹ 原載於《新生報—橋》168期(1948.9.8)。

是一點團結力都沒有嗎？拿手的祇是倒戈，只會妒忌。」他如此懷疑臺灣同胞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大哥曾經參加反帝運動，卻遭到臺灣人同志的密告，入獄後受拷問而死的緣故。再加上，在戰爭末期日本警察對臺灣人使出引誘的手段，靖彬也被此計給套住，與一個行踪神秘的陳西彥搭上線。之後以前他的同志一個個被日本警察給抓走，他因此被誤認為叛徒，後來才知道那是「陳西彥所為」。受誹謗而感到困攪的他，最後跟陳西彥一起被推選為臺灣學徒志願兵促進委員，半年後，他參加了在東京宮城前舉行志願兵入營的儀式，並宣誓「我是神子天皇陛下的一赤子，決以忠誠打退暴虐無道的支那和惡道米國的罪惡」。從軍的他被派到太平洋的一個孤島，在戰敗之際，被難耐的饑餓和炎熱的兵卒給打倒。故事最後交代被他密告而入獄的同志，光復後在回臺的船上，看到靖彬的日本妻子和兒子，不堪戰敗後日本生活的困苦，在踏上臺灣旅途中疲倦且悲慘的遭遇。這篇小說扼要的記錄著在巨大的歷史轉輪下，被犧牲生命和幸福的臺灣人的命運。

葉瑞蓉的《高銘戟》¹¹² 寫的是一個志願成為文藝工作者的高銘戟，一直盼望著渡日圓夢，然而由於戰爭的爆發使得海上交通受阻，並且戰爭結束後，因日本教員大批的遭到遣返，引起教育界師資缺乏的恐慌，他就過起當教員的生活。但不久由祖國來了一大批教員之後，他在學校的重要性也相對降低，加上看到自己的學生已學會祖國語文，並且投稿的小說已刊在報紙上，因而對自己的處境感到茫然。高銘戟的處境所代表的是，過去依賴日本而孕育出來的希望，在光復後得不到圓滿的結果，反而因其他的因素而更加快速消失的無奈。作者藉由這樣的人物，呈現出在臺灣社會仍然存在的頑固殖民性，同時表達出個人處在時代劇變之中的無奈。

¹¹² 原載於《新生報—橋》169期(1948.9.30)。

三、戰後初期的社會狀況

光復不久，臺灣人民對新時代、新社會的期望，面臨嚴重的挑戰。他們熱烈期盼一個平等、自由的國家，並且希望建立一個依能力而受肯定的社會，但是許多現實情況卻不允許他們圓夢。因此他們開始表達出嚴重的失望和不滿的情緒，以及對現實的批判。這些臺灣人民的失望和不滿，或以批判接收政權的無能，或以厭惡大陸來臺人士以淘金心態看待臺灣，而發洩出來，於是逐漸形成省籍之間的緊張關係。光復之後過了一年，所呈現出來的社會結構性問題，以及嚴重的民生問題，致使之前昂揚一時的政治氣氛遭到挫折，並在文學上確認了一個方向，那就是與其期待新社會的到來，不如思索如何解決現實問題，這才是更重要的時代使命與任務。因此，這個時期大多數的小說，仍然以短篇的形式，夾敘著當代社會的諸多問題。

描寫當代社會面貌的小說，大體上分為兩種，一是僅止於描寫戰後初期社會的貧困面貌，另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省籍問題。屬於前一種類型者，首推丘平田(蘇新)的《農村自衛隊》。¹¹³ 這篇小說如實地描寫在二二八以前貧窮的農村社會，老百姓不能安居樂業的情況。「我」接到叔父的信，回到故鄉，知道兩個年幼的侄子已因患天花而亡，而大侄子也去內地與共軍打仗的事實。不僅如此，透過下面叔父所說的話，知道農村已處於無秩序的混亂狀態。

說什麼防疫不防疫，跟著臺灣的光復什麼都光復了，一切的惡習慣、賊子光棍、法師乩童也都光復了，尤其是「漢醫」光復得特別多，阿貓阿狗，只識些藥草，就說他是怎麼高明的「漢醫」；別

¹¹³ 原載於《臺灣文化》二卷二期(1947.2.5)。

說有效無效，第一藥草價錢賤，西藥價錢貴，誰肯就西醫呢？鬧得西醫關門大吉，「天花」滿村飛，「霍亂」遍地起，不知枉送了多少生靈落地獄呢？¹¹⁴

可見光復後不久，在農村已蔓延漢醫、法師等以迷信與欺騙來治療疾病的風潮。西醫怕發現天花或霍亂之後沒有顧客，不敢向官廳報告，又怕一般愚人或法師、乩童等的攻擊；而法師和乩童們，都不承認天花霍亂是種「傳染病」，亂用消滅天災的方法，並煽惑一般村民，只顧自己的利益。而可憐的一般老百姓受盡折磨之後，還賠上生命。這些事情在過去日本時代是被禁止的，因而民衆對官廳的欠缺管理，表示不滿與憤怒。從叔父「說什麼取締不取締，大人們有什麼辦法？別人的兒子是死不會了的。何必管別人的生意兒做什麼？」中，可以感覺當時民衆對接收政權的憤怒與無奈。叔父本來對於社會的公事非常認真，為要打破迷信，提高村民的科學知識，都願意向前去做的人，但是面對不理想的現狀，他說話帶著酸味的口氣，已經顯露出筋疲力盡的模樣。

農村的問題不僅在衛生方面，在治安方面暴露出更多的問題。由於一些人成群結黨、携刀帶棍，挖走蕃薯、割去稻草，農民們只能歎息治安壞，並無他法可施。警察也因人力不足，而束手無策。整個社會的無秩序和昏亂日益加深。

你們年輕人開口就喊「自由平等！」，是的，現在臺灣也自由了，天花霍亂自由猖獗，流氓賊子自由搶劫，工廠自由倒閉，農村自由荒廢，奸商地主自由囤積，老百姓自由叫餓！光復後的臺灣，是何等的自由呀！¹¹⁵

¹¹⁴ 同前注，頁30。

¹¹⁵ 同前注，頁31。

對戰後初期全臺灣的狀況，極盡嘲諷控訴。接著叔父提出批判中國內戰的看法，如「同胞殺同胞，有什麼大功！對內勇敢，對外卑怯，這是我們中國民族的特性！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並對於「我」所提出憲法即將實施，有臺灣的代表出任，因此社會狀況很快就會好轉等語，更是嗤之以鼻，叔父說：「我們的代表個個都有政治手腕，不錯！他們做了參議員，做了國大代表，就做了銀行的董事，做了官營事業的理事；他們財也已經發了，地位也已經高了，他們關於賺錢做官一定是有辦法的，是很有手腕的，可是這與我們老百姓有什麼相干？」強調民意代表，無論哪裡出身，都不顧民衆，只顧自己利益的現狀，吐露出對民意機關的不信任。因此，農民只好靠自己的力量，來保護自己。

我們村裡人大家已經覺醒了，目前曾開過了一個家長會議，磋商要怎樣來保衛這個「平田村」，結果，大家以為「文」的時代已經過了，現在是「武」的時代，強的贏，弱的輸，所以決定要組織一個「平田村自衛隊」，各里一班，各班設一個「武館」，每戶凡有十五歲以上至四十歲的男子，都要加入；每夜在「武館」訓練武藝，這事已擬定正月十五，就要開始。¹¹⁶

可見戰後初期的農村社會已經到了公權力不彰，治安問題嚴重敗壞的無秩序地步。小說結尾也安排「我」從故鄉回到臺北，發現家裡也遭到偷竊，可見治安的問題已擴散到全臺灣。這篇小說是為了批判當時的社會現實而寫，指出戰後初期政府的無能與疲乏民生的狀況。

此外，《新生報—橋》副刊所刊載的幾篇小說，也有對當代民衆貧窮生活的描寫。蔡德本的《苦瓜》¹¹⁷寫的是阿金婆忍不住偷吃別人的苦瓜，而遭到主人毆打的故事。阿金婆的兒子土獅在日據末被動員到菲律賓，却不

¹¹⁶ 同前注，頁32。

¹¹⁷ 原載於《新生報—橋》124期。

幸在戰爭中被炸死，媳婦後來也逃走；無人照顧的阿金婆，由於物價驚人的暴漲，以致買不起新鮮的苦瓜，因而淪落到當小偷的地步。

還我的孩子。假如孩子在，我怕什麼苦瓜貴呢？吃到吃不完。
啊！爲什麼土獅死得這麼笨呢？呆子。呆子。拉土獅去當兵的日本
鬼子死盡了好。給土獅炸死的美國飛機也一樣。¹¹⁸

作者透過在殖民時期兒子被迫犧牲生命，光復後也仍然過著悲慘生活的臺灣母親，來凸顯如果實際情況沒有得到改善，對一般民衆而言，改朝換代也未必有意義的事實。阿金婆之所以只因偷吃苦瓜就遭到毒打，是因為物價上漲引起農村的人心荒廢，因此作者尖銳的指出，臺灣民衆的苦難並未因戰爭的結束及光復而結束。

謝哲智的《拾煤屑的孩子》¹¹⁹也是透過擔負全家人生計的孩子阿新，在煤炭的山堆中拾煤屑而被抓，在掙脫的過程中，不幸跌斷胳膊的悲慘境遇，揭露戰後初期的貧窮狀況。

「一家的費用靠我們賺著。我們不願當要飯的，也不願當小偷，而來揀些煤渣又有什麼不對！」這個叫聲使年青的工人，好像被雷光打著一般的感覺，不知何故手就軟起來。因爲他曉得，孩子們來拾煤不是他們的罪惡，就是社會造成的罪惡，孩子們如此的受難也是和他自己受苦的情形沒有相差。然而要是一想起「我們靠誰吃飯？」的問題，就不能容忍這樣的行爲。因爲假使讓孩子們隨隨便便地偷去，那麼他們要負責吧——至少也要賠償，甚至被控爲竊盜罪而吃虧……¹²⁰

¹¹⁸ 《文學界》10集(1984年·夏季號)，頁225。

¹¹⁹ 原載於《新生報—橋》181期(1948.11.14)。

¹²⁰ 《文學界》10集(1984年·夏季號)，頁249-250。

可見在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不只像阿新這樣的小孩，連文中的年輕工人也同樣受著生活的逼迫。王溪清的《女扒手》¹²¹也描寫戰後初期的社會亂象。一個耿直的年輕人在公車上錢包被扒走，找扒手理論時，聽到女扒手的艱辛故事之後，反而給她錢並安慰她，但後來從朋友那裡卻聽說那個女扒手，專門以欺騙為生，因而受到衝擊倒了下去。他由於戰爭而失去父母，故鄉也變成廢墟，好不容易收拾心情來到都市，準備過新生活，然而在週遭的欺騙與貧窮中，所經歷的卻只是顛倒的價值觀與沈落的人性而已。

民國三十一年被日軍強制著去海南島當砲灰，好在今年六月，出生入死的乘帆船在安平上陸。回到離別四年多，這可懷念的故鄉臺南，一看，家也沒了。爸媽也死了。只有一個哥哥在轟炸後的殘骸上蓋了一間小小的房子，跟家裡人們賣些東西。跟大街上寫的標語比較起來，從前眷戀著的臺南完全成了廢墟的樣子。而且就連大學畢業的也找事難的如今，像我們這樣，又沒學歷又沒有運動費。能找什麼事幹啊！¹²²

殖民時代的終結，並沒有帶給民衆日常生活的改善，在戰爭中好不容易保住生命的臺灣青年，在光復後重建的延遲、失業的增加、腐敗的社會氛圍中，再也提不起精神，終於屈服在現實的條件下。

除了這些刻畫貧困狀況的小說之外，第二種小說在其內容上涉及了省籍問題。其中較多的是透過沈淪的女性形象，來表現臺灣處境的小說。呂赫若的《冬夜》、張冬芳的《阿猜女》、歐坦生的《沉醉》，¹²³均以臺灣女性與大陸男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為題材，鮮明的揭露出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面貌。《冬夜》的主角彩鳳在十八歲時跟臺灣青年木火結婚，但結婚僅

¹²¹ 原載於《新生報—橋》173期。

¹²² 《文學界》10集(1984年·夏季號)，頁246。

¹²³ 依序原載於《臺灣文化》二卷二期(1947.2.5)；《臺灣文化》二卷一期(1947.1.1)；《文藝春秋》五卷五期(1947.11.15)。

僅五個月，木火就被迫當了「志願兵」入營，被派到菲律賓的前線去了；回到娘家的她，必須賺錢維持生計，因而進入酒館。彩鳳之所以當酒館小姐，是父親和自己的失業所導致的，而他們都是受到終戰後的種種社會變遷的影響。

她會走進了酒館裡的種種原因，都是在終戰後所發生的。在光復的歡天喜地之中，一切物價破天荒之飛漲起來了，而且最不幸的就是因統制組合解散而她倒失業的。她的父親屢次重新地圖謀生意的復業，但是需要高額的資本，所以就辦不到了。¹²⁴

在此種環境的逼迫下，彩鳳當起酒館小姐，不久，被一個大陸來臺並且只知道女色的郭欽明看上，受到他的逼迫，不得以與他結婚。「你這麼可憐！你的丈夫是被日本帝國主義殺死的，而你也是受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摧。可是你放心，我並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不會害你，相反地我更加愛著你，要救了被日本帝國主義殘摧了的人，這是我的任務。我愛著被日本帝國主義蹂躪過的臺胞，救了臺胞，我是為臺灣服務的。」每當彩鳳講起木火時，郭欽明總是如此說，可見當時大陸來臺的人所持的心態是如何。然而，他的話言蜜語只是一時的，結婚半年後，他發現彩鳳染上梅毒，便以辜負他為藉口，把彩鳳趕回娘家去，並要求還回三萬元的聘金。為了還聘金，彩鳳只好公然的賣春。從在戰場上死去的木火、大陸來臺的大財子郭欽明，到嫖客狗春，彩鳳的不幸經歷代表著殖民時代與光復後混亂的社會狀況，對貧窮的民衆而言，帶來的同樣是不幸的深淵。

張冬芳的《阿猜女》寫的是屬於中產階層的女教師，遭到大陸來臺上尉的強迫，失身後與他結婚，後來他的太太和兒子來臺找他，才知道自己原來被騙，回到娘家後一病不起的故事。猜女原本有一個心愛的青年，他

¹²⁴ 《呂赫若小說全集》，頁285。

也是被日本政府強徵去當「學徒兵」，不久在兵營裡，因汽車事故受傷而死。因此，猜女的不幸可以說，從殖民時代持續到光復後，造成她不幸的因素，先是日本軍國主義奪走深愛的人，後是大陸來臺上尉的欺瞞。

《沉醉》中的臺灣女性阿錦是一個外省人家庭的下女，她在幫一個因二二八事件受傷的外省人楊先生治療時，愛上了他，但是由於楊先生並沒有真心對待她，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騙她，因此她逐漸失去人生的意義。在小說中，阿錦的癡情與楊先生的偽善，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呈現出當時社會上較為普遍的現象—臺灣女性與大陸男人之間的不平等戀愛。雖然小說偏重於描寫阿錦的心理狀態，而失去更加貼近當代核心問題的機會，但是透過阿錦對自由戀愛及對男人的幻想，顯示出缺乏理性的自由戀愛的悲慘結果，並且控訴楊先生和他朋友的欺騙行爲，正是造成如阿錦一般天真少女不幸的原因。阿錦所要忍受的不僅是戀愛的失敗，她還受到太太誤解她與先生之間的關係，而被趕了出來。如阿錦這般的少女，在當時的臺灣社會相當多，她們擔負全家的生計，離開家庭到外地做事，不幸受到外省男人的欺騙，而再度掉入不幸的深淵。

此外，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¹²⁵ 正如名稱所示，是篇描寫終戰當時混亂社會的小說。主角范漢智是一個唯利是圖、投機取巧的人物，他在殖民時代當漢奸，光復後搖身一變却當起從大陸來的「唐山人」，盡做有利於賺錢的勾當。他原本在臺灣做督察處的特工工作，比一般人早知道日本會戰敗的消息，因此事前將妻子與財產搬到大陸，而一聽到日本投降，立即捲款潛逃到南京。之後被接收臺灣工作的新聞所吸引，決定回到臺灣撈一筆。到臺灣之後，他有了科長的頭銜，開始與戰爭姑娘¹²⁶ 玉蘭交往並與她結婚。之後不管合法與否，能賺錢的事他都投入。例如，他介入敵產處理過程，將日本人留下來的房子佔爲己有，專門搜購日人賤賣的物品，甚

¹²⁵ 本篇小說於1948年5月以日文出版。

¹²⁶ 戰爭姑娘指的是因戰爭失去婚姻機會的小姐。

至介入國營公營事業的販賣，走私不法木材等。

例如接收的工廠不能全歸國營或省營，不久就會標賣的，那時候高一點價錢也沒有關係，先標買下來，買了以後如果資金不足就把買回來的工廠做抵押向銀行借款來做生意。現在我國正在貨幣膨脹中向銀行盡量的借來物資，那麼二三個月中物價已漲成二倍。借一百萬即賺一百萬，借一千萬元則賺一千萬元，工廠停工也可以賺錢，所以最近狡猾的傢伙把接收下來的工廠停工，利用龐大的資金大大的賺了一筆了。¹²⁷

可見他利用接收工作混亂，到處都有漏洞，到處都有著可以賺錢的機會，毫不忌憚的搜括財物。他的太太玉蘭是個追求理想人生觀的人物，因此對丈夫越來越感不滿。她不但嫌惡丈夫那種商人利慾薰心的劣根性，以及一切生活習慣，更令她吃驚的是丈夫「沒有國家觀念」。

玉蘭，世間是商場和戲臺，會動腦筋的，就發達。口口聲聲雖說愛國或忠義，那也是為的是飯碗。攻訐官吏不好的是自己想做官而做不到的人，攻擊貪污的是貪官污吏的蛋兒。總之世間全部是矛盾。五四運動時的志士中也有人變為貪官污吏。革命志士中也有人會做錯。如果孔子今天還在的話，恐怕也會受到貪污的罪。基督耶穌也恐怕會是戰犯。因為我們孔子儒家的後代在全世界裡有最多的貪官。基督的信徒在世界上是武器製造的第一流兇手哇！玉蘭，臺灣真是好地方，由重慶只穿一領西裝來，不久就可以做百萬富翁，或千萬長者，真好。¹²⁸

可見他是完全被金錢左右的機會主義者，一點也沒有國家及民族意識。這使過去受過教育當過看護士，並迎接新時代而滿心希望看到國家強盛的玉

¹²⁷ 《臺灣作家全集—吳濁流集》，頁197。

¹²⁸ 同前注，頁184。

蘭，感到失望至極。范漢智的這句話，徹底毀滅了原本認為自己丈夫是紳士的玉蘭的想法，現在玉蘭感到自己和丈夫之間「好像擺不掉似的有點兒矛盾存在」。加上當時臺灣人對外省人的印象普遍變壞，這些都影響了以為自己丈夫是唐山人的玉蘭，以致她每天在後悔與不安當中過日子。小說結尾安排一位曾經是五四運動的健將，現在當起搜索隊長的志士型人物，如何逮捕范漢智到案，以及對這些人發出「四萬萬五千萬，怎麼會有這麼多漢奸和貪污官吏呢」的歎息。

這些小說的共通點，在於以臺灣女性與大陸男性的問題為媒介，解剖當時社會的一個斷面。而其抨擊的焦點，則對準了大陸男性的負心，或著他們的淘金心理，以及因而造成的社會失序現象，犀利地反映出當時社會問題的核心所在。

此外，歐坦生的《十八響》與《鵝仔》¹²⁹ 用不同素材來反映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面貌。《十八響》的內容敘述一個因腸胃有病而常放屁，得到十八響綽號的公務員，成為同事消遣的對象，但是同樣犯此毛病的局長，同事卻是以另一種嘴臉相待。對此，「十八響」先生感到非常不滿，認為「一個公務員，只要能奉公守法，按步就班」，「不相信會沒有發達的一天」，因為「政府是公平的，賞罰分明；政府不會虧待守法的公務員……」。但局長卻以「神經錯亂」為由把他免職了，並由據說是局長叔公的人來補缺。就如呂正惠教授分析的一樣，這篇小說係作者透過「十八響」這個小人物，「在臺灣處處目睹極其腐化的國民黨官僚體制，因而發出的不平之鳴」。¹³⁰ 另外，《鵝仔》的內容說的是臺灣小孩阿通所喜愛的鵝仔不小心闖進外省處長的宿舍，處長太太不但佔為己有，還把牠宰來吃掉，卻要求阿通拿一千銀去贖鵝仔，阿通從姊姊那裡偷了錢，但是知道鵝仔已被吃掉，因而和處

¹²⁹ 原載於《文藝春秋》六卷三期(1948.3.15)和七卷四期(1948.10.15)。

¹³⁰ 參見呂正惠，〈發現歐坦生—戰後初期臺灣文學的一個側面〉，《人間》(2000年·夏)，頁227。

長太太爭吵的故事。這篇小說內含多重主題，沈痛的揭出當代社會的病貌：第一、就表面來看，處長太太的蠻橫無理與阿通的憤慨，形成強烈的對比，加上阿通不撓不屈的抵抗與討回公道的決心，有助於揭露位居高官者以佔便宜為能事的世態；第二、處長太太之所以如此蠻橫無理，是其背後有她先生處長的職位為之撐腰之故，而當事務所小使的阿通父親，就只能處處委曲求全，祈求她的原諒，從中暴露出懸殊的階級差異；第三、從上面兩種對立當中浮現出省籍之間的緊張關係。小說最後以描寫處長太太的勝利結束，控訴戰後初期臺灣人民所期待的公平正義，還沒能得到實現，呈現出作者對當代社會的批判觀點。因為阿通和處長太太之間的差異，根植於金錢與地位的不同，因此可以說作者顯示出對現代性的懷疑與否定。

以上我們所探討的戰後初期小說，其所呈現的焦點，從反映民衆感受光復的喜悅與對新歷史創造的期待，以至針對殖民統治的批判，逐漸轉移到面對現實，揭露社會的混亂與矛盾面貌，清楚的展現出戰後初期臺灣人民的感受—政治上的期待與挫折，以及就如只追求個人利益人物的大量登場所示，包含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批判。

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